

为人文教育辩护

(美) 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
梁栋 译

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FAREED ZAKARIA

DUKU

读
库

策划编辑 张立宪

版权编辑 杨芳州

美术编辑 耿冰

助理编辑 薛佳佳

谢佳熹

特约审校 田巍

马国兴

张钧

朱秀亮

献给我的三个孩子
奥马尔、莉拉和索菲娅

我们为信息所窒息，而渴求智慧。今后的世界，将属于能总览全局者，他们在恰当的时间运用恰当的信息，以独立的思考来做出明智的选择。

——爱德华·奥斯本·威尔森
(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创始人)

目录

第一章	来到美国	1
第二章	人文教育简史	20
第三章	学会思考	44
第四章	自然贵族	70
第五章	知识和权力	92
第六章	为今日之年轻人辩护	103
	原书注解	120

第一章

来到美国

想要过好日子其实不难。先上大学，然后再退学。白天学计算机科学，晚上编程。开一个科技公司，然后迅速上市。这，就是最新版的美国梦。要是你不喜欢冒险，那就学电子工程。

只有一件事是你不应该去做的，那就是接受人文教育^①。在这个世界上，人文教育的概念公认是和美国各名牌大学、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美国，人文教育已不怎么吃香。在这个技术和全球化主导的世

^① 人文教育原文为liberal arts。又译为博雅教育、通才教育、文科教育、素质教育等等。原是希腊罗马时代定下来的基本教育方针。这个方针和中国古代的“六艺”及儒家的教育思路相似。为统一术语，liberal arts college在本书中译为人文学院。请注意西方传统的人文学院也常有理科专业，而且这些人文学院一般是独立的高等院校，专门从事本科教育，不隶属于某个大学。——译注

纪，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基于技能的学习。政治家、商人，甚至很多教育家，都认为这才是一个国家维持竞争力的唯一途径。他们敦促学生少做梦，多想想将来工作中会用到的实实在在的技能。以开放的心态来追求知识，则被看作是没有前途。

经典的人文教育几乎没有人来倡导。保守派嘟囔着，这也太自由了（但这个自由不是自由党的自由）。而自由党呢，又觉得这太精英主义了。对一个学生来说，拿到一个心理学的学位，却不知道派什么用处。至于家长呢，则害怕这种教育将会花去他们一生的积蓄。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了。虽然大学入学率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攀升^[1]，但主攻英文或是哲学的学生比例则急剧下降。1971年时，百分之七点六的学士学位发给了英语文学。到了2012年，这个比例降到百分之三，同一时期本科选择商务的比例从百分之十三点七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点五。

高等教育走向了职业教育而不是人文教育，有些人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但在上一次的教育普及过程中并没有这样的现象^[2]。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学生并不把大学仅仅看作是高级职业学校。从社会低层和低教育移民家庭出来的孩子，对人文教育抱以极大的热忱。他们不仅把教育视作通往职业的阶梯，更将

其视为融入美国文化的必经之路。如同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中所说的那样：“我的英语一定得是一流的。”^[3] 美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增长期，恰好就是像英语和历史之类的专业大行其道的时期。

美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绝不是太多的学生追求人文教育。统计数据表明^[4]，2011年至2012年度，百分之五十二的美国大学生就读于学制为两年或少于两年的学院，百分之四十八则就读于四年制的大学。两年制的学院里，最受欢迎的专业是营养健康和相关科学（百分之二十三点三）。还有百分之十一点七的专业属于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在四年制的大学里，情况与此类似。商务专业一枝独秀，囊括了百分之十八点九的学生。健康专业位居其二，占百分之十三点四。另一项研究指出，所有本科学位中只有三分之一授予了人文学科^[5]。在所有的本科学生中，进入阿姆赫斯、斯沃斯莫尔或是波莫纳这样典型人文学院的只有百分之一一点八。

所以说，学习历史、文学、哲学或是物理、数学的学生，根本不是已经过剩了。大部分学生倾向于专科，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职场所需。说到美国人需要更多的技术培训，要懂更多的科学，这是没错。但是为技能教育敲锣打鼓的人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学生并没有涌向工程、生物这样的专业——不是每

——而是让他们匆匆遗弃了人文，改投商务和传播的怀抱

个人都有学科学的脑子，仅仅是让他们放弃了人文而拥抱商务和传播。这些学生本来可以选择一些不仅更为丰富和深刻，而且也是他们感兴趣的课程，然后再补充一些计算机和数学方面的知识。不管怎么说，技术培训方面的缺口显然不是由一小部分学生选择四年制人文教育所致。

事实归事实，这一类的呼声有愈演愈烈之势。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以及威斯康星的州长宣布他们将不再资助州立大学的人文科目^[6]。“培养更多的人类学家是不是本州的要务？”佛罗里达的李克·斯科特问，“我不觉得。”威斯康星则计划撤销任何与工作岗位不直接挂钩的科目。“我们到底要赞助多少个哲学博士？”广播主持人威廉·本奈特问北卡州长帕特里克·麦克罗里。对这一反问，麦克罗里是打心眼里赞同（可笑的是，本奈特本人恰好就是哲学博士，这个教育背景好像对他在政府、媒体、非盈利性机构和私营公司中的辉煌履历不无助益）。

高喊打倒人文教育的，并不只是共和党^[7]。能够直接带来就业的教育，是所有政客都乐于鼓吹的。奥鼓吹的教育巴马总统在2014年1月的一次演说中提到：“说真的，需要专门技能的制造业或是贸易，多半可以让大家挣更多钱，胜过一个艺术史的学位。”后来他为此道歉，并说这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但事实上奥巴马在

自问自答道

类的质询
奇怪

其任期内吐露过类似的说法：在当今世界，大学生应该注重能让他们得到一份好工作的技能。他的思路 and 很多自由党、保守党和中间派是有共鸣的。轻视人文教育的想法在华盛顿取得了罕见的双边支持。

这些对人文教育的攻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人文教育的理念在今天似乎失去了说服力。推崇它的人需要极力为之辩护，而反对它的人则确信这最多是个奢侈品，在最坏的情况下还有适得其反的作用。在这个手机应用大行其道的年代，学习英语文学到底有什么用？

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和美国精神背道而驰。在历史上，美国向来是以提供非技能主导的教育而著称。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娅·高尔丁和劳伦斯·卡兹在其详尽的教育研究^[8]中指出，历史上，英国、法国和德国很早就对儿童进行测试，然后只教育他们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教育方案也是设计为传授一系列被认为是他们的职业所需的关键技能。“美国的系统呢，”他们写道，“可以被称为开放、宽容，缺乏普遍标准，学术与实践并重的课程设计。”美国没有采用欧洲模式，即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实习。因为美国是一个不断前进，~~在建立新城市、郡县，开辟疆土方面，寻求新机会的民族。~~他们不是植根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并只能通过早已确立的商业行会来接触新鲜事物。他们的经济是崭新、动态

从小就对儿童进行考核，并只教育他们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个所谓的教育方案也不过是传授一系列职业所需的关键技能

建立新的城市和郡县，开辟新疆土，寻求新机会

的，因为技术不断改变工作的性质，并由此改变了工作的要求。少有人愿意一辈子都从事同一个职业。最后，高尔丁和卡兹声称，虽然全面教育比专业培训更昂贵，但是这个教育的费用不是由学生或家长承担。美国是第一个由公立基金来普及全面教育（先是中学，然后是大学）的国家。直到今天，美国的高等教育仍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广泛和丰富。今天的美国中学生可以从一千四百所授予传统学士学位的高校中择一就读，还有另外一千五百所课程略为缩减的学校可供选择^[9]。高尔丁和卡兹指出，用人均的标准来看，英国的大学数量只有美国的一半，而德国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那些试图把美国高等教育重新定位为职业和技术导向的人，需要看清这一点：他们所呼吁放弃的，恰恰是历史上独特的教育方针，是真正的美国式教育。

话虽这么说，我不是不了解当下对职业的执著。我自己是六七十年代在印度长大的，在那里，基于技能的教育是取得良好就业的唯一出路。那时印度人对技术的力量崇拜得无以复加。从1947年独立以来，它就被嵌入了这个国家的DNA。印度的第一任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0]对大型工程项目十分热衷。他认为印度只有通过拥抱技术才能摆脱落后的经济。在他任内的十四年中，极尽所能贯彻了这个理念。作为一个

费边社会主义者，尼赫鲁对苏联照此方针在几个十年就实现经济腾飞尤为仰慕。列宁曾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统治加上全国电气化。”尼赫鲁把印度的水电大坝称作“新时代的圣殿”。

我在孟买上的是一所名为“大教堂和约翰·卡农”的私立学校。此校由英国传教士在维多利亚时代创建，推崇宽泛的人道主义教育。我就读时这个学校依稀还有当年的风范，但是国家的大环境是极端追求实际的。七十年代到处经济都不景气，印度尤其如此。虽然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但学费并不贵，便于广泛吸纳中产阶级。其结果就是我所有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对职业前景无比热衷。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工程和医学是最好的两个职业方向，问题归结到这两个选哪一个。

年头

专长

我们当时十六岁，面临三个学术方向：科学、商务和人文。为此我们当年参加了一系列的考试——英国教育模式的遗留——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向。在那个时候，选择本身不是问题。聪明的孩子学科学，有钱的孩子学商务，而人文，那是女孩子的选择。这么说有点夸张，但和实际情况也相去不远。我几乎想都没想就选择了科学。

十二年级末的时候，我们又参加了一系列考试。这次的考试至关重要，我们被一再告知，它决定了我

们将来的去向。学习成绩、课堂参与、课外活动、老师推荐——这些对考试分数都全无影响。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以考试分数作为唯一录取标准。事实上，工程类院校只看三个科目：物理、化学和数学。同理，医学院只看物理、化学和生物。英语文学学得怎样，没人感兴趣。印度最著名的工程学院——印度理工学院（IITs）把录取标准进一步收紧。它们有自己的入学考试，只根据这些考试的结果择优录取。

七十年代对技术和实用性的注重有国内的原因：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私营企业被国有化和宏观调控所钳制。还有国际的原因：直到七十年代，英国的大学一直给拔尖的印度学生提供奖学金，这是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产物。~~不过当时~~英国自己的经济也是一团糟，1979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受接济方，给外国人的奖学金自然也没有了。以前，印度最出色的学生可以去上牛津剑桥，或是伦敦大学。现在没了奖学金，他们只好待在家里。

~~但是~~文化跟着权力走。大不列颠的经济衰退让它们的大学失去了吸引力，这时美国大学的财富和雄心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在我的学校，大家开始注意到美国的大学为留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一些先行者传回来的独特的美国式教育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那里一个去了康奈尔大学的朋友夏天回来，大谈特谈他在

一流

但当

并于。。
时

那里的经历。他说，不管你是什么专业，都可以选修多得不得了的各种科目。他还提到校园生活的丰富。我记得他讲述康奈尔的电影社组织放映了英格玛·伯格曼和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电影。听到看电影也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简直惊呆了。大学真有这么好玩？

我的父母并没有让我走专科的道路。父亲打小就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他年纪轻轻就成了孤儿，通过财政补助上完了高中和大学。1944年，他取得奖学金到伦敦大学深造。他到达伦敦时，正是闪电战如火如荼、德国V2火箭肆虐伦敦的光景。在坐船去英国的漫长旅途上，船员都说他是疯了。有一个甚至问道：

“你没看过报纸吗？大家都在忙着逃离伦敦。你去那儿干什么？”但我父亲决意要接受高等教育。历史是他的偏爱，因此他专攻这方面的博士。不过，他也需要一个职业前景，因此他额外又拿到了一个法律学位，以便回到孟买能从事律师的行当。

明确的

相形之下，我的母亲出身条件较为优越，但她也是年纪轻轻时就遇到一个坎——父亲在她八岁时去世了。她上过一段时间大学。这个学校在当时颇不寻常，是位于北印度的文科学校，名为伊莎贝拉·索伯恩大学，由一个美国循道宗教士于1870年创办。虽然因为要回家照顾守寡的母亲而不得不放弃学业，但是

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大学的岁月，经常回忆起那里丰富和引人入胜的科目设计。

然后

我的父母在职业上都颇有建树。父亲从律师干起，后来从政，之后又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他同时也开了一间小的制造公司（总得赚点钱），并总是忙于著书、撰文。母亲开始时是社工，后来成为新闻工作者，为报纸和杂志工作，直到去年（2014年）才以七十八岁的高龄退休。他们都不主张过早专业化。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肯定也为我的职业前景操过心——没人不为此操心。但是幸好他们没有把这些焦虑投射到我和我哥哥的身上。

我哥哥阿尔沙德迈出了第一大步。他比我年长两岁，一向学业骄人。他同时也是优秀的运动员，这让我难以追随他的足迹。他的高考分数足以让他进入任何印度顶级的工程学院，他也可以参加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相信一样能取得高分，但他决定申请美国学校。他有几个朋友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大家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比方我们听说要通过SAT考试，但这是考什么我们就不甚了了。要知道，这是1980年的印度，那时还没有谷歌。说真的，连彩电都没有。我们在美国大使馆新闻处，一个文化部门，找到一本小册子。这上面说SAT是能力测试，没有必要准备。因此我哥哥就真的没有准备。考试那天，他就那么走进

了本地大学里临时设立的孟买考场。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寥寥无几，房间里几乎是空的。

对现在的人来说，恐怕很难相信当时申请美国学校的想法有多新奇、多可怕。整个系统都是陌生而遥远的。大家根本不知道进入一所好的美国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在印度就业有何种程度的助益。七十年代的时候，孟买的哈佛校友会还不是一个权贵的名人录。他们只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要么曾在海外混过（因为父母曾在海外就职），要么跟美国有点瓜葛。我们有几个朋友已经杀去美国，但因为他们还没有毕业、开始找工作，所以他们的经历也谈不上有多大帮助。

我哥哥完全不知道美国大学的录取办公室对印度的教育系统有何种了解，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看待他的成绩汇报卡和推荐信。他也没有什么后路。如果他当年不接受工程学院的录取的话，明年是不可能再站回这个队的。事实上，我们无知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都不晓得美国的学校要提前一年申请。因此哥哥莫名其妙地在高中和大学中间留出无所事事的一年，只等看有没有学校要他。

结果呢，所有的学校都要阿尔沙德。他从中选了看起来最好的一个——提供奖学金的哈佛大学。我们当然都很兴奋，也很得意，但很多朋友听到消息都表达了忧虑。哈佛当然听起来很显赫，但是毕业以后能

找到工作吗？

1982年秋天，我母亲和哥哥来到美国。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七十年代的不安还未退去，八十年代的蓬勃还未到来，整个国家陷入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越战和水门事件粉碎了公众的信心。苏联的地位在我们心目中冉冉上升。暴乱、示威和城市暴力把美国城市变得相当危险。~~纽约在人们心目中和查尔斯·布朗森的电影联系在一起。新闻报道充斥着毒品和犯罪。~~

在我们心目中，纽约的形象是从查尔斯·布朗森所演的电影和有关毒品和犯罪的新闻报道中来的

所有这些对印度人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印度的传统社会把六七十年代诠释为美国文化的衰落期，因为年轻人在道德上变得放纵、自我沉溺、悲观以及叛逆（这也许是最糟的）。对印度的家长们来说，美国年轻人对长辈的不尊重是绝对难以接受的。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孩子到了美国，很快就会把家庭、传统和信仰抛在脑后，沉迷于性、毒品和摇滚乐。要想把孩子送到美国，就得先做好“失去”这个孩子的思想准备。

像所有的哈佛新生一样，阿尔沙德刚到美国的前几周还有点紧张，但我母亲回来以后却没有任何顾虑。她对美国，对它的大学校园和本科教育都充满信心。她把观感写成一篇名为《另一个美国》^[11]的文章，发表在《印度时代》上。在文中她描述了行前的

疑惑全消

种种担忧，对美国大学的悲观，对毒品和叛逆的恐惧。实际来到校园里，她才发现这里注重的是教育、努力和课外活动。她所遇到的学生都聪明、能干，而且出乎意料地尊重长辈。她见到一些家长在眼泪汪汪地与孩子告别时，已经在计划下次来访，或者是感恩节的团聚。“我觉得又回到了印度，”她写道，“这还是那个没有心肝的美国，那个家庭纽带失去意义的美国吗？”

我母亲接着说，印度对美国的种种认识都是错的。她试着解释为什么印度人会读到那么多关于美国的负面新闻。“美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社会，因此他们的缺点也前所未有的暴露在外。”她写道，“美国人对自己的衰落并不讳言，但这衰落是相对于此前的强盛。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逃离恐惧的避难者不断在这个移民的国度寻求庇护。美国每年花费巨资促进知识进步（并不限于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果我们要评价美国，美国是唯一的准绳。”很显然，她彻底被美国征服了。

当时，在印度的精英圈子中流行指责美国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冷战期间，印度政府和苏联站在一起，英迪拉·甘地首相常常把印度的问题归结为“外国干预”，说的就是中情局。但我母亲一直固执地维护美国。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有时会批评美国

的罪行，部分是为了刺激哥哥和我，部分是因为，作为一个曾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人，他吸收了盟友的世界观，而这些盟友都是左派。尽管如此，我母亲的立场从不动摇，她坚信美国是一个富含活力和美德的国度（她之所以能接受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在这个国家安家，这可能是主要原因）。

我母亲从美国带回来的，除了照片和各种信息小册子，还有哈佛的课程表。这课程表让我大开眼界。印度大学的课程表不过是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上面干巴巴地列出一些科目。而哈佛的课程表是厚厚的一大本，上百门各类科目在这里争奇斗艳。课程描述读起来就像是广告，好像老师在呼唤你加入智力探险。我把这本大书读了又读，惊叹学生竟然不用先选择专业，他们同时可以选修诗歌和物理，历史和经济。在地球的另一边，虽然我对人文教育的实质还不甚了了，也尚未体验过真正的人文教育，但我对其理念已是一见钟情。

我决定追随哥哥的足迹，放弃印度的大学。我参加了SAT考试，写了所需的文章和申请材料。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一心要去美国，我也没办法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印度的大学感觉有诸多限制。我也想过英国的学校，但奖学金是个大问题。牛津剑桥固然很好，但是在那里闭门读书，显然没有美国常春藤大学花样百出的生

活更有吸引力。此外，还有美国本身的魅力。

我从来都对美国有好感。我十几岁的时候去过一次那里，但对美国的了解多半来自于好莱坞电影。印度上演的美国片当然不是最新的，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几年前的片子像《波塞冬历险》或是《克莱默夫妇》之类的，要么就是经典老片。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劳** 老瑞和哈迪”系列喜剧。七十年代中期，电视开始普及。最开始只有一个政府台，放些关于印度农业辉煌的黑白纪录片。每个星期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会聚集在一起，观赏一个不掺水的娱乐节目：宝莱坞电影。这前面是一集电视喜剧《我爱露西》，可能是印度电视台唯一能有钱从美国引进的节目。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电视剧，喜欢露西以及她的疯狂家庭。直到今天，我都对这个节目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七十年代末，更多的西方技术进入印度。我的一些朋友开始有了录像机，后来我们家也有了。没办法得到正版的美国电影电视录像带，但我们拥有的盗版也不少。美国的亲戚会把最新的节目录下来，寄给在印度的家人。这些盗版录像带就像苏联的地下出版物一样在孟买流传。

那时候最热门的、也最让我们如痴如醉的秀是《达拉斯》。开场放演职员表时的情景就是我美国梦的窗口：闪闪发亮的摩天大楼，直升飞机降落在办公

楼群之间，从巨型的凯迪拉克里走出戴着牛仔帽的得州大款。而维多利亚·普林斯普——她绝对是我美国梦的一部分。不管报纸怎么津津乐道于美国的问题，有这些影像在，谁能相信这些问题真的存在？银幕上的美国是如此广大、富足、充满活力。在那里，一切都是特艺七彩^①。

美国新闻处是冷战期间设立的推广美国文化的机构。他们会放一些美国经典老片。我和一个朋友常去看这些老片。在孟买一间小小的黑屋里，坐在一群上了年纪的侨民中间，我就这样接触到了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我把看过的片子都记下来，从《一夜风流》、《亚当和夏娃》^②到《西部开拓史》^③。某种意义上，这是我学习美国历史的真正入门课。它们更加深了我对美国充满活力的印象。

但话又说回来，理想纵然美好，金钱也不可忽视。我父母的工资都颇高，但印度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父母的年收入加起来也足够付我在美国半年的学费。那时，美国学校对我这样的外国学生，录取

① 原文为Technicolor，是一种电影彩色胶片重印手法，以其鲜亮和栩栩如生著称。——译注

② 原文*Adam and Eve*。此处估计作者记忆有误，他有可能是说*All about Eve* (1950)，即《彗星美人》。——译注

③ *How the West was Won* (1962)。此片其实不属于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作品。——译注

的时候还要考虑财政状况。那年头学校得到的捐赠很少，但是它们也发放一定的绩优奖学金。如果你被录取了，他们会提供一个集资助、贷款和校园工作的组合。据我哥哥说，他在哈佛的奖学金加上校园里的工作收入已经绰绰有余，甚至还有零花钱来买书和干其他的事。但是意识到我不仅需要被录取，还需要拿奖学金，这增加了我的焦虑。

我后来十分幸运，上了耶鲁。我不知道为什么录取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决定去那儿。现在的美国孩子很有福气，他们在做决定之前就已经去过学校两三次，坐在课堂里，还和辅导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看学校戏剧团的演出等等。相比之下，我的决定完全是在黑暗中做出的。哈佛没有要我，但我很幸运，可以在普林斯顿和耶鲁之间选择。对这两个学校，我都一无所知，所以也无从决定去向。如果我要客观地把两个学校的优点列一张表的话（我确实这么干了），那普林斯顿一般会胜出。这个学校更小、更有钱，给我的奖学金也更多。因为爱因斯坦的缘故，在印度人人都知道普林斯顿。听起来难以置信，耶鲁在印度不为人知。我父亲跟很多印度人一样都没法念出这个名字，直到去世时他都把它念作“爱尔”（ale）。总的来说，美国在印度或是亚洲知名的学校多半是强于工程、科学或是商业。这些都不是耶鲁的强项。

最后，我只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掷硬币。人头，我就去耶鲁；反面，我就去普林斯顿。我扔了一次，是反面。于是我决定再掷，三局两胜。我不记得耶鲁是不是这样就赢了，还是我一直这么掷下去直到它胜出。但这么做的结果是，我意识到自己想去的是耶鲁。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直觉的力量。两个都是顶级学校，但耶鲁对我是完美的。还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某种我不能解释的东西。

耶鲁那个时候（现在也是）为一年级的学生提供所谓“导向学习”的严格程序，~~这是对西方文学和哲学传统从古希腊到现代性的大扫荡。~~ 这是一个对一个从印度来的孩子，这似乎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它能让我对一系列听说过却没有真正读过的西方经典有所了解。这些课程需要申请才能读，于是我赶快申请了。几个月以后，我收到通知说我已经正式进入这个程序。

我很兴奋，但~~又有几分害怕。~~ 最后还是临阵退缩了当我真正来到耶鲁，必须要最后确定选课计划。我把我似乎应该选的课也列成一个表，像数学、计算机编程、物理之类的。我意识到如果真的选了~~指导性~~ 导向学习的话，我的时间会全部被它占满。把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事情上，这想想也让人害怕。我还记得我对自己说：“等到夏天我回了印度，别人会问我选了什么课，如果是计算机或者数学那还好

但一年级的
时候，我
还是给自
己一个机
会，选了一
门纯粹是
出于兴趣
的课程。这
是

说，但这……”所以我最后还是没选指导性学习，而是选了那些看起来更合理的课程。

~~但我还是会让自己纯粹出于兴趣选某一门课。第一年的时候，我选了一门颇受欢迎的冷战历史课。~~老师是政治科学教授H. 布拉德福德·韦斯特菲尔德。他的课十分精彩，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细节，让我叹为观止。

国际政治和经济一向是我的所爱。还在印度的时候，我就喜欢读各大国际报纸和杂志，它们有时候出版几周之后才能到达印度。那时候的全球大事件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对抗的余波也会传到在这两个阵营之间摇摆不定的印度。我还记得亨利·基辛格的回忆录出版的时候，我囫圇吞枣地看完了（我那时十五岁）。但我从来没想到这种事也可以在大学里作为一个专业来学。我一向以为我会选一个实际的、技术的、职业导向的专业。报纸，自己闲暇时来看看就行了。韦斯特菲尔德的课让我认识到，兴趣也可以成为专业，尽管专业还不是职业。那年春天，我选择了历史专业，向人文教育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虽然我还是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人文教育？

第二章

人文教育简史

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上，教育不过就是职业培训。猎人、农民和战士教会年轻人怎么狩猎、种庄稼和打仗。统治阶级的孩子则接受战争和统治艺术方面的教导。所有这些教育都是为了年轻人将来在社会中要担任的角色做准备，而不是为某种更广泛的目的。然而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改变了这一切。

大意

在这变化发生之前，希腊的教育侧重发展arête，意为“卓越”或“美德”。学者布鲁斯·金巴尔指出，这种教育主要涉及记诵荷马史诗^[12]。通过沉浸在众神、国王和武士的世界里，孩子们不仅要掌握希腊的语言，还要吸收统治精英认为重要的法则、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身体训练是希腊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巴达城邦是极端的例子。在斯巴达，男孩子刚

就是这种侧重走向极端的一个例子

生下来就面临体格测试，弱者被抛弃，任其死亡，剩下的则被送往训练营接受严格残酷的训练，很早就成为一名士兵。

公元前五世纪，有些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我们的制度叫作民主，”雅典议员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上称，“因为权力不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是属于全体人民。”^[13]对政府的革新需要同时对教育进行革新。仅仅习得自我生存的基本技能已经远远不够——公民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以便能够治理自己的社会。对希腊人来说，更广泛的教育观念和自由之间的关联变得重要了。为向后世示范这个观念，罗马人专门发明了一个词——“自由”

(liberal) 教育。自由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跟自由人有关的”。两千多年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看到了这一点。当他的主人听说小弗雷德里克读书很好时，他怒道：“学习会把最好的黑鬼也毁了的。如果他学会读《圣经》，那他就永远不会做奴隶了。”^[14]道格拉斯回忆说：“我本能地赞同这个提法，从那时起，我看到了从奴隶到自由的康庄大道。”

从一开始起，对于文科教育的宗旨，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也许这些不同意见就包含在这个教育的理念中^[15]。第一次大分野^[16]发生在古希腊时，哲学家柏拉图和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之间。柏拉图和他的学生

佩里克勒斯

怒道

没法

人文

就已经包含了不同思路共存的必要性

们，包括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就是追寻真理。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们采用辩证的方法来追寻知识最纯粹的形式。伊索克拉底呢，呼吁向arête的传统看齐。他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最能让一个人同时取得德性和良好生活的方法是学习修辞、语言和道德。把人文教育视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还是目的自身，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总的来说，对人文教育比较实际的理解在古代世界占了上风，但这两个传统不是相互排斥的。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最早在书面文字中使用“人文艺术”（artes liberales）一词^[17]。他认为对真理的探寻和修辞的技能可以结合起来。“因为尽善尽美的演说必须源于知识。”^[18]他于公元前55年写道。虽然争议仍然存在，事实是，人文教育一向综合了实际的一面和形而上的一面。

从一开始，科学就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不同的是，那时学习科学的目的和现在对此目的的理解完全两样。在古代以及之后的多个世纪里，科学是通向抽象真理的途径。科学没有实际的用途。~~大文科目，譬如语言和历史，~~则恰恰相反，能够为政客、朝臣、
而像语言和
历史这样的人文
科目
律师和商人提供必要的技能。尽管如此，希腊和罗马人在修习修辞和语法的同时还要修习几何、天文。公元前一世纪，这个双重教育观终于定型为所谓的“七

艺”^[19]，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几个世纪以后，七艺常常被划成两组：所谓的前三艺包括语法、逻辑和修辞；而后四艺则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

士兵和政客很自然地把他们认为更实际的项目排在前面，这恰好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人文学科。即便是如此，广博教育的宗旨总是在那儿。八世纪时，法兰克帝国（囊括今日的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卢森堡）的皇帝查理曼统一帝国后建立了以他的御用学者阿尔琴命名的宫廷学校^[20]。阿尔琴是一位英国学者（即便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已经是当学监的理想材料了）。他注重语法和文本分析，降低了数学的地位，但他的教育还是某种形式的人文教育，教育的深层目的仍然存在。即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修道院里还是保持了学习和求知的传统。

欧洲的教育系统走出修道院可能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21]。今天很难想象，伊斯兰文化是中世纪最先进的文明。伊斯兰世界里有所谓的马德拉萨（madrasa），就是阿拉伯语的学校，这里不仅教授历史、政治、科学、音乐和很多其他科目，还进行科学研究（虽然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教育机构都被称为马德拉萨）。这些研究颇有成效，特别是在数学上取得一系列革新。代数（algebra）这个词就是从阿拉伯语al-

jabr而来，意思是“把分开的部分合并起来”。波斯学者阿尔·花刺子模（al-Khwārizmī）的名字被拉丁文译为“algoritmi”，后来就成了算法（algorithm）的代名词。到十一世纪时，开罗的阿尔-~~爱资哈尔~~（al-Azhar）、巴格达的尼扎米亚（Nizamiyah）以及很多其他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中心因~~为~~其学术成就而享誉全世界。在欧洲大陆的穆斯林地区（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科尔多瓦、塞维利亚等），伊斯兰的影响也可圈可点。

阿扎尔

中世纪末期，欧洲的停滞已经走到了终点。全球贸易和旅行的兴起意味着领袖们在地理、法律和科学等领域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一个城邦和另一城邦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人才和教育上的。

其

的集散地

因~~为~~漫长的海岸线，意大利成为一个贸易、商业和资本主义~~开始汇集的地方~~。在意大利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学者们开始聚集起来研究神学、经典、民法和其他的学问。这些学者大多是远道而来，~~可以~~被他们的地理位置划分为不同的~~nation（这直接导致nation，即~~

常

“族群”（nation，即国家一词之原意）

族群

整合其他机构而成为所谓的

~~国家一词~~。某些“国家”雇用了本地学者，主持测试，并组合其他机构而成为大学（universitas）。这些机构往往获得特殊法律权限，从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和自治。

1088年，欧洲第一所大学于博洛尼亚成立。接

下来的一个世纪，类似的机构在巴黎、牛津、剑桥和帕多瓦纷纷出现。到1300年，西欧有了十五到二十所大学^[23]。这些学校一开始并不是自由言论的堡垒，但某些学校确实讨论了禁忌话题，重新发现、翻译和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并把法律置于缜密研究的范畴。然而因为宗教的影响力，那时候大多数科研还是在大学之外进行的。比方说由科学家来揣测地球在星辰中的位置，这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在大多数城市里，虽然学生享有和宗教人士相似的自由的特权，但他们还想要更多。帕多瓦大学的座右铭是：“帕多瓦的自由对人人适用（Universa universis patavina libertas）。”

到十四世纪，实用和哲学知识之间的平衡再次被打破。某些意大利学者和作家认为大学已经变得太专门化了，他们想要让欧洲教育回到希腊罗马的轨道。这些人文学者拒绝中世纪大学所擅长的高度具体的、学术化的神学，~~并~~主张，如同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所说，“文艺的复兴，雄辩和求知的复兴”，“导向对古代经典文学和历史全新的、更深入的研究”^[24]。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所谓的文艺复兴式~~人文~~人道主义传遍了欧洲各地。

~~而~~这些学术传统并没有直接造就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作为一种现代传统，~~直接~~归

他们
这种主张

人道

而

我们所说

因于学院而非大学。“所谓的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说道，“基本上是英国的传统。”最早的英国学院是由十三世纪学习神学的学者所创立，德尔班科认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大众为捐赠人的灵魂欢呼，因为他们捐了钱，所以可以免去卑微的工作”^[25]。在这些早期的学院里，宗教的影响是巨大的，比方公众演讲^[26]就是主日布道的一种俗世延伸，尽管具体的科目是多样化的，也包括很多非神学内容。

十九世纪的学院变得更世俗化了^[27]，因为此时专门的神学院承担起培养牧师的职责。它们同时也开始发展出一种有别于欧洲大学的特点。这些大学，特别是德国的，逐渐侧重于研究而非教学。大学常常没有明确的物理特征，而学院则有特定的建筑作为标识。一座宏伟的石头建筑前面一个宽广的庭院，再环绕以学生宿舍。所谓的“公共”房就是学生聚会的场所，还有小教堂可供祈祷，图书馆可供学习。这个由英国始创的住宿学院的模式传到美国，成为本科学业的特有形式。

破折号

二十世纪早期，在所有主要大学中，哈佛和耶鲁采用了学生全面住宿制，以便提供人文教育院所特有的亲密氛围，同时也兼顾其成为著名科研大学的雄心。住宿学院从而被视作提供了某种特殊的品质，这些品

此

质在课程之外增加了人文教育的魅力。今天，人们通常将它描述为“边生活边学习”，“同侪教育”，或是“横向教育”^[28]。哈佛的传奇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是这样描述它的独特魅力的：“仅仅是书本学习，演讲和阅读也许足够。但只有学习、论辩、饮食、祈祷、游戏都在同一个学院的小圈子里，大家经常性地近距离接触，才能获得个性这种无价之宝。”^[29] 强调塑造个性，这是从学院的宗教起源而来。到处的学院都以此为宗旨，至少是在理论上。

世界各地

美国最开始的学院是依照英国的模式建立的。比方说，很多哈佛学院的创立者都是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毕业生^[30]。也许因为是在殖民地的缘故，这些学院没有一上来就专注神学，而是在课程表中纳入了种种其他科目，譬如科学、人文学科以及法律。学生要在这些科目之间发现联系，因为这背后的意思是，当时的理解是有一个神的意志在推动所有这些。大主教约翰·纽曼这些学问把。。概括为概括这种十九世纪的教育观为“知识的方方面面都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他们都是造物主的手笔”^[31]。这也许是现代物理所谓“统一场论”的一个神学版本吧。

美国学院最初的科目可以被概括为“上帝和希腊”，也就是说它主要是神学和古代经典。但在十九世纪初，争论出现了。人们开始质疑学习古希腊和拉丁语的必要性。他们建议把现代语言和现代的理念作为教育

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快速发展，相形之下学院里教的东西显得过于老化。经过多方斟酌，耶鲁大学于1828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为经典科目辩护^[32]。这份报告对美国学院影响深远——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延迟了不可避免的进化。这份报告同时也揭示了人文教育直到今天都存在的核心问题。

耶鲁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33]。它描述了两种教育的目的：一种是训练大脑怎样思考；一种则是为大脑灌输特定内容。

知性文化的两个要点是头脑的训练（培养它的力量）和充实（知识储备），然而前者也许更为重要。因此，大学课程的主要目的乃是每天以严格的手段锻炼学生的心智。所有课程的设计，教学的方法都应该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怎样才能最好地传授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艺术，怎样有序思考，怎么分析事物，怎么明辨是非，怎么组织论据，怎么平衡各方面的意见，怎么唤醒、提升和控制想象力，怎么安排记忆，怎么激励和引导自己的天分。^[34]

虽然耶鲁报告历史上的目的是为经典科目辩护，但它的主要论点是，学习怎样思考比具体科目和书本更为重要。一位哈佛人五十年后试图援引同样的论点，但他的目的却是要推翻这份报告的结论。

查尔斯·艾略特的履历并不适合哈佛校长的职位^[35]。那个时候像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之类的学校校长一般都由神职人员担任，而艾略特是个科学家。自1853年从哈佛毕业后，艾略特先是在学校里担任辅导员，后来成为数学和化学助理教授。但他始终没能成为一名正教授。与此同时，厄运连连，他的父亲破产了。艾略特决定到欧洲旅行。这旅行让他首次亲身接触到欧洲大陆日新月异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德国科研大学的兴起。1865年艾略特回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那个时候，如同很多其他学院，哈佛也处在其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期^[36]。内战刚结束，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学校面临发展更多的职业教育以储备劳工的迫切需求。

针对这些问题，艾略特写就一篇名为《新教育》的论文，分两部分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37]。文章开始的设问（如果不考虑性别）几乎是任何今天的父母心中所想：“我能为我的孩子做些什么？我可以负担，也乐于负担他最好的培训费用。要是他能成为一名牧师，或是学者，那我当然会很自豪。但我觉得他不是那块料。我想要给他的是实用教育，一种我没能获得的职业准备，能让他接手我的生意，或是其他买卖。”艾略特的回答是，美国需要把欧洲最近兴起的科研大学所提供的最新方向，和美国学院最好的传统

结合起来。

艾略特提议美国各大学积极接纳科研的功能，但这功能限于研究生的级别，而保持本科自由探索的特色。他对教育的新方向，譬如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差别、技术培训的兴起有透彻的了解。他希望学院在技能培训和人文教育之间做出仔细甄别，后者显然更为重要。论文发表几个月后，查尔斯·艾略特获得哈佛校长职位（年仅三十五岁），在这个位置上他通过四十年的努力，改造了大学和国家教育的面貌。

艾略特在哈佛的种种革新举不胜举，可以说他一手创建了现代的美国大学。但他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至少对本科教育而言，是所谓“自发的选择多样化”^[38]。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的系统里，学生有很少的必修课和很多的选修课。在此以前，美国的学院里大部分的课程表都是固定的，学生能选的课程，每年学习的进度都是事先决定好的。用耶鲁报告的话来说，用来填塞学生头脑的“家具”是由教师来决定的。

艾略特完全不同意这个做法。也许他是受了新教的影响，相信个体是自己命运最好的仲裁者。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路和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一脉相承。爱默生的美国理念在当时颇具影响。对爱默生来说，任何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学会用它来表达自己。在《自立》一文中爱默生写道：“相信自

己，每一颗心都随着超灵的铁弦颤动。”^[39] 爱默生对本真性和独特性的推崇和对复制的反对，几乎就是苹果公司著名的广告“异类思维”的原型。

在1885年的一次演讲^[40]中，艾略特为他的选课系统辩护所用的语言直到今天听来仍然颇为激进，很多家长也许没有办法同意。他说：“过了十八岁，美国男孩已经过了外在强迫规训还有任何价值的年龄。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可以自己决定需要学习的科目，不是为别的男孩，也不是为一个虚构的一般男孩，而是只为自己。这个决定将胜过任何校方决定，或是任何不知道他的根底和前世今生的智者所做出的决定。”艾略特认为美国的人文教育应该允许你选择自己的道路，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由此实现独特的自我。很多人认为有些科目不值得教授。他的办法就是，让教师提供学生所需，而学生则选取他们所爱。

艾略特的看法并不被很多当时有影响的教育界人士所赞同，尤其是普林斯顿的校长詹姆斯·麦考士^[41]。事实上，我所引用的艾略特的讲话是他和麦考士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公开辩论的内容。麦考士来自苏格兰，是牧师兼哲学家。他认为大学应该提供一个特定的、主次分明的学习框架，不然就是辜负了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职责。有些科目，特别是宗教，不能和其他科目并论，也不能随便退出。艾略特的想法和美国文化崇

尚自由和个人的一面更为合拍。一百年过去，选课制或其变种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形式（当然也有几个例外）。

二十世纪早期，大量移民进入美国。移民潮让某些公民、教育者和官员担心美国已经失去了它独特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约翰·厄斯金开设了一门为期两年的课程，称为“综合荣誉课程”（General Honors）。哈佛学者路易斯·梅南写道，厄斯金“想要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共同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在美国已经式微”^[42]。厄斯金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沉浸在古代经典之中。

到了1930年，莫蒂默·阿德勒离开哥伦比亚来到芝加哥大学^[43]。阿德勒曾在厄斯金的综合荣誉课程中担任讲师。他的朋友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新近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校长。他们俩开始教一门专为本科低年级学生提供的西方经典课程。这门课最后演变成了“好书精读”的课程表，学生要研读事先定下的历史、文学、哲学方面的书籍，然后参加由教师引导的小组讨论。几年后，两个名叫斯特林费洛·巴尔和斯科特·布坎南的教师从芝加哥转移到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并在那里启动他们自己的“好书精读”项目。以“七艺”为原则，巴尔和布坎南对这个小学校的本科教育做

出了巨大改动。连科学都是从“好书精读”的角度来教授，因此涉及到阅读著名然而多半已经过时的科学论著。这个项目完全没有选课的余地。

到了三四十年代，随着1921年和1924年定额移民法的引入，移民潮已经不复当年之威，对核心科目的需求也随之减弱。今天，美国大约一百五十所高校提供某种形式的、基于好书的核心项目，但除了哥伦比亚、芝加哥和圣约翰几所学校，大部分都不强制所有本科生修习这些科目^[44]。

基于好书的课程表有种种的优缺点，一向是争议的主题。所谓的“好书运动之父”哈钦斯于1952年在一篇论文中写道：“直到最近，教育的康庄大道在西方一向是由好书铺成的。一个人不能称为是受了教育，除非他熟知自己文化传统的经典作品。”时代变了，但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不能“否认传统，或是减弱传统对现代人的重要性”^[45]。我们看到，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所有支持好书计划的人，他们的理由无非是，在某个美好的年代里，大家一向研习一套固定的经典作品。事实上，自人文教育之始，学什么，不学什么，学生能有多大的自由度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一直众说纷纭。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玛莎·娜斯鲍姆指出，苏格拉底式的探寻法从根本上排斥“基于道德权威的经典文献”。她写道：“在当代的文化战中，

很多保守派时常把希腊拉上台，充当经典好书课程表的英雄人物。可笑的是，希腊哲学家最有说服力、最无异议地证明了，恰恰是这种课程表的局限性。”

[46]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系列变化，从自己是学生起，到我在学校教书，再到现在成为家长。在大学里，这个公共课的想法对我有相当的吸引力，虽然我没有走这条路。我真心希望自己更透彻地了解某些领域、某些概念，因为我现在常常要自己补课。八十年代开始教授本科的时候，我发现学生都极聪明，但同时他们对某些最基本的领域，比方说美国历史的概要，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分析辨别能力很强，但是只要你给他们六个事件，要他们按正确的时间顺序排列，很多人都会弄错。由此我认为熟知一些基本事实，熟读一些经典书籍——为大脑置备些“家具”——可以为自由的思考打下坚实基础。要知道，大多数推崇公共课的人，并不认为这些就是足够的人文教育。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的好书项目允许加上很多选修课。从比例上来讲，公共课只占总课程的一部分。

公共课也有一定的社会优势，因为所有学生都共享一个知性体验。他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享受它的精华，一起吊慰它的不足。说到底，这是一个广交朋友的机会。关于哥伦比亚的公共课，德尔班科写道：“等到

他们学完公共课，所有学生都不再彼此陌生。”^[47] 这种属于一个大群体的感受，等学生正式踏入职业社会，和同道们一起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时，会变得更加有用。随着校园的日益多样化，学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极具针对性的课外活动上，总得有什么东西来定义大学作为集体教育体验的一面。

我仍然支持对公共课的种种辩护，但现在对人文教育的开放性，比以前更为重视：所谓人文教育，根本就是让思想自由地驰骋，自由地放牧。就我自己来说，那些因为我觉得自己需要去了解，涉及专业领域或文化背景而选的课程在脑海里已经逐渐淡去，而那些我真是很感兴趣的，或是被一位优秀的老师所感染的课程则始终铭记在心。说到底，想要了解一个问题，可以看书，或是直接用谷歌。真正难以做到的是学会用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分析数据、陈述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享受知性冒险，把思考作为家常便饭。

热爱学习在今天比过去是更大的挑战。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个被无处不在的娱乐节目所包围的环境中成长——计算机、平板电脑、电话等等。也许很快这些娱乐形式就会成为他们大脑里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今天的游戏、电视节目和视频所呈现出来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诱惑力，让人目不暇接。这些娱乐不乏很

有原创力，~~有些甚至考量智力的~~——有些游戏很聪明的——但所有这些都设计成捕获孩子的心智，并让他们上瘾。当代娱乐形式的这种力量很容易让需要积极和长时间投入的脑力劳动（譬如阅读和写作）相形见绌。

特别

然而阅读，~~我要强调的是~~阅读书籍，是通往真正知识的根本通道之一。要深入了解一件事，读一本有关的书往往是最好的办法。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以后也不会改变。小孩子需要享受阅读，而不是把它看作是让他们玩游戏或是看电视的条件。如果说现在十几岁的孩子不愿意读简·奥斯汀的小说而要看菲利普·罗斯的《再见，哥伦布》，那也行。我不是要指控或是限制新的娱乐和技术形式，它们往往改变知识的面貌和我们思考的方式。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孩子将比我们更聪明、更敏捷。但是一个好的教育系统必须面对我们当下所生活的世界的现实，要充分考虑到这些现实所蕴含的问题和挑战，而不是装作它们不存在。

当然，学校里还有一些奇怪的课程，比方说“东非诗歌里的跨性别角色”之类。这些课程光听名字就足以让保守派捶胸顿足。他们的态度可以理解，因为这些课程的题目实在是很狭窄、很离奇。然而这些课程之所以存在，往往有非政治的原因。我们的人文教育中某些最有争议的项目不能归因于某种教育理念，而是由官僚体制一手促成。当美国最好的学院成为世

界最好的大学时，对后者的考虑开始压倒前者。科研在大多数学校已经压过教学，光是教学好根本拿不到终身教职，因此学校的科目设置也被科研的方向所牵制。对教授来说，开设那些基本的、对学生最有用也有意思的课程是一件无聊的苦工，而基于他们目前研究方向的研讨班则简单得多，虽然这些课题关注的问题极为狭窄、少有人知，对本科生来说完全不相干。知识专门化了，学校的课程也随之变得晦涩难懂。今日学院种种不可思议的课程，不光是某个左翼教授在颠覆体制，也是因为这个逻辑在发生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独立于任何人文教育理论的，这就是人文作为一门学科的松懈。最近几十年来，美国高校的成绩基本上在不断上升^[48]。1960年的时候，得A的只有百分之十五，今天这个比例升到百分之四十三。这个变化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促成。学生的素质确实得到了提高，但也不能忽视官僚和哲学上的因素（比如六十年代对等级的蔑视）。我个人可以作证，给学生高分对于教职人员来讲是有利的。在哈佛当学生助理的时候，我很快发现，给学生B⁻或更低，意味着他们会来找你抱怨，让你重新考虑，给他们一个机会重做，甚至是找到他们的导师或是院长申诉。这一切都增加了我的工作量。给他们一个B⁺或是A⁻就轻松多了。当然，A还是要留给真正优秀的学生。我对

这个方案不是没有抵制过，但肯定是不止一次地采纳了。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但我注意到A或者A⁻在哈佛的比例已经从1986年的三分之一上升到2006年的一半^[49]。今天，哈佛最常见的分数是A，连A⁻都不是。

一个世纪以来，人文教育最大的变化就是对科技主题的排斥。历史上，人文教育自希腊罗马发端起，科学探索就扮演“自然哲学”的角色。中世纪时，科学被视作一种理解造物主的创作和人在其中位置的努力。但是科学革命，特别是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让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日渐凸显。这导致科学在人文教育中的位置不复以往。以前，科学探索是虔诚的朝圣，致力于解开生命的谜题和目的。现在，如同安东尼·克龙曼指出，科研的兴起意味着“一个物质的宇宙观，这个宇宙的结构可以被精确地描述，但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由此，物理科学对生命意义这一类问题不能再有任何贡献，这已经变成一个无关的问题”^[50]。科学变成只有科学家才关心的问题，这无疑是整个社会的损失。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量子物理的出现，普通人更觉得科学晦涩难懂，和其他领域的知识没办法挂钩。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C. P. 斯诺写了著名的“论两种文化”^[51]。他警告说知识的两极分化

已经导致两个阵营之间“不仅是互不沟通，还互相仇视”^[52]：

我参加过很多文化精英的聚会，这些参加者按传统的文化标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对科学家对文化的无知都表达出莫名的惊诧。有这么一两次，我实在忍不住问道，那你们谁能不能描述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对此问题，大家无不报以冷眼（但真的没人知道）。我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科学版的“谁读过莎士比亚”。现在想来，就算我的问题更简单些，比方说，什么是质量、加速度，那就是科学版的“你认字吗？”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十有八九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现代物理的辉煌成就把西方世界大多数最聪明的人甩在了背后，把他们摆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的位置。^[53]

2003年，哈佛当时的校长劳伦斯·萨默斯重申了斯诺的意见，号召本科教育回归对科学的基本把握^[54]。普林斯顿前校长雪莉·蒂尔曼自己是个科学家，她在2010年提出，美国当今社会对科学的普遍无知导致了对公众政策的讨论缺乏成效^[55]。她认为，非科学家需要了解科学，而科学家最好也多了解其他科目。然而这方面近年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在面向二十一世纪人文教育的改革方面，最有希望和最雄心勃勃的努力不在美国，而是在离美国

十万八千里的新加坡。2011年，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在亚洲共同创建了一个新的人文学院，称为耶鲁-NUS大学^[56]。2013年秋天，学校开门迎接了第一批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一百五十七名学生。当我还是耶鲁的受托人时，我积极地支持了这个举措。这个计划不是没有风险，但它的潜力也不可低估：它在一个经济快速腾飞然而教育仍然停留在技能主导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人文教育的滩头堡。

两所学校的学者都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审视人文教育在全球村的新内涵。耶鲁-NUS的科目表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精华，并对它们加以完善，一方面也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的新理念。2013年4月，学校的特立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阐述学校宗旨的文件。这份文件，如果正确实施，也许可以成为未来人文教育的典范^[57]。

耶鲁-NUS报告的革新相当激进。首先，学校不再是人文学院，而是人文科技学院。它把科学重新纳入本科教育的核心。它废除了专业系别，把它们视作妨碍跨学科交流和协同效应的屏障。它也有公共课，占去了前两年的大部分时间，但此公共课有别于哥伦比亚-芝加哥的模式。耶鲁-NUS的公共课让学生面对一系列不同的思考方式。比方说，有一门课介绍试验科学如何进行科研，另一门课讲授统计学如何帮助

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通过这些课程，学生学到的不是科学事实，而是科学方法。不论他们将来的主修方向是什么，他们都知道科学基本的操作模式。

耶鲁-NUS也包括一些经典书籍，但这些书不是作为文化扫盲单子上的名目，而是作为特定思考类型的样板。它们之所以值得读，不是因为所谓的知识必须包括这些书，而是因为通过仔细分析这些书，学生可以获益良多。问题的要点仍然是放在求学的方法上。学生不仅学到怎么读书，怎么辨析文学、哲学或者是艺术里的种种思想观念，也学到怎么写作。这个科目要求学生把项目带到课堂外面，让外面的世界教会学生书本里没有的东西。这个部分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有一次我问杰夫·比克斯，时代华纳的首席执行官，什么是商业中最有价值的技能，而学校里却没有教授。他马上回答说：“团队协作。你要知道怎么和别人工作，让别人想和你一起工作。这是一个关键技能，但是教育几乎完全是关于自己怎么干好一件事的。”

耶鲁-NUS最大的创新来自于这两个学校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它们合作的性质^[58]。在同一门课程里，学生不仅要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要研究佛祖和孔子。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伦理观有哪些异

要知道他们

这么一来

绘摆在一起看。当然，当他们学习现代历史、政治和经济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站在一个比较的位置上，一个美国或者亚洲其他学校所不易达到的位置。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是一个没有多少实质的陈词滥调，或者变成是西方人批评西方的借口（如作家弗朗兹·法农或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的批评），而耶鲁-NUS的科目能提供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教育氛围，为学生进入多元文化世界提供必要的准备。学习其他的社会，最终会让学生更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了解西方，或者是中国，或是印度文化的精髓。

耶鲁-NUS还在初创期，因此不一定能完全实现其理念。它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人文教育的问题。自由探索的精神和新加坡封闭的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的抵触也是一个障碍。但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师们对学院的目标和要务有精妙的理解：把教学摆在核心地位，重新确立科学的重要性，把必修公共课和开放式探索结合在一起，面向世界的未来，并充分考虑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了解在教育中的关键作用，这一系列改革指向人文教育的复兴。耶鲁-NUS应该成为整个世界学习的样板。

如果人文教育已经尽善尽美，还是找不到工作，应该怎么办？1852年，大主教纽曼写道，受过人文教

育的学生是为了自己去“了解知识的伟大轮廓”^[59]，而不是去获得求生的必需技能。即便是那时，他知道，也有怀疑此论是否实际的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问题在人文教育创始之初、伊索克拉底的年代就已经存在，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纽曼知道他的批评者会问：“这条路通向何方？到哪里截止？有什么用？如何受益？”或者，如同已故耶鲁校长巴特利特·吉迈帝一篇美妙的演讲题——“这些教育究竟可以派上什么用场？”^[60]

所以，~~这些~~教育究竟可以派上什么用场？

那么，人文。。呢

第三章

学习思考

当人们称道人文教育的美德时，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它教会你怎么思考”。此言不虚。但对我来说，人文教育的核心美德是教你写作，写作让你思考。不论你做什么，清晰、简明和快捷的写作能力都是无价的技能。

大学一年级的時候，我选了一门英语作文课。老师是一个牙尖嘴利的年长英国人，他的红铅笔也很锋利，给分数从不留情面。我写的论文被退回来的时候旁白上注满了评语，指向文中不清楚的概念或是表达不够明确的词句。我意识到，从印度来的我也许考试技能、重复和死记硬背的能力很强，但自我表达的能力则很差。到上大学的时候，在考试方面我已经身经百战，但论文一篇都没有写过。在七十年代的亚洲，

很多

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即便是很好的中学。直到今天，有些地方仍然如此。

逐渐认识

随着学期的进展，我发现自己的所想和所写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这绝非易事。要想写清楚，首先要想清楚。我认识到，这两个过程密不可分。有一个故事也许不是真的，但可以说明我的意思。有人问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关于一个特定问题的意见，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还没写呢。”

现代哲学里有这样一个争论：思维和语言，孰先孰后？我们是先抽象思考，然后再付诸文字？还是直接用文字进行思考，用文字搭就思考的框架？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当最开始写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对一个问题的认识通常是一堆半生不熟的想法，它们之间有很多逻辑上的空缺。正是写作本身让这些概念获得秩序。写作一篇文章的初稿本身就是一种求知的过程：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现我的想法之间的逻辑关联，看我的结论是否基于事实。不管你是谁——政治家、商人、律师、历史学家或是小说家——是写作让你在现有的想法里去芜存菁，提供秩序和清晰的表达。

你觉得这还不够实用吗？问问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贝佐斯执意让他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交书面备忘录（常常是长达六页纸的文档），每次高级管理会

议之前的三十分钟，有一段不说话的时间，大家各自阅读这个备忘录并做注释。如果说要提议一个新产品或是新的策略，那这份备忘录必须采用报纸通讯的形式，使用简明扼要、人人能够看懂的语言。在和《财富》杂志亚当·拉辛斯基的访谈中，贝佐斯说道：“完整的句子比较难写，一个句子有动词，一段文字有一个主题句。要写出六页纸的完整叙述，没有清晰的思考肯定是不行的。”^[61]

诺曼·奥古斯丁在回忆他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首席执行官的年月时写道：“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我领导的公司雇佣超过十八万人。这里面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有超过八千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我发现，对~~晋升机会~~最有利的因素就是能否以书面形式清晰地表达~~他的~~思考。”^[62]

人文教育的第二个优势就是它教会你如何说话。耶鲁-NUS报告提出要把“清晰表达”作为其知性体验的核心部分^[63]。这当然涉及写作，但也包括口头表达能力。比方说，要能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观众面前做演示，把科学实验的结果解释清楚，令人信服。清晰表达的最深层目的是说出你心中所想。这不是说不论时间场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学会了解自己的想法，过滤掉不成熟的念头，然后以某种逻辑顺序来向外界展示你的思维。

印度学校和美国学校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美国，口头表达是成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的教授对我的评判，不仅基于我能不能想清楚一个问题，也要看我能不能把我的分析和结论大声说出来。研讨班是人文教育的核心教学手段，它让学生学到怎么阅读、分析和剖析。最重要的是，他让学生学习如何表达自己。这种对“清晰表达”的重视还体现在每个人文学院都有的多项课外活动中：戏剧、辩论、政治团体、学生政府、示威团体等等。要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你常常需要吸引周围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了解和参与你的计划，很多时候这一切要在坐电梯的时候以极短的时间完成。

事实上在早期的人文教育中，对演说的研习和实践有更显赫的地位。修辞学曾是一个重要科目，甚至经常是最重要的科目。它不仅和哲学有密切关联，也和支配力、行动力直接挂钩。在印刷术出现前的几个世纪里，口头表达是社交生活和职业生涯的核心。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英美大学教育仍然保留对演说能力的重视。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科研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侧重点，印刷文字成为主要的大众媒体，对演说不如以往那么强调了。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在英国，因为诗歌朗诵和雄辩术的强有力传统，公众演说仍然极为重要。英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是下议院，在这里词锋锐利

最易引人注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英国人说起话来都言之凿凿、风度翩翩，这不仅是个口音的问题。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让口头表达能力变得更为关键。不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公众演讲，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产。不论想法有多好，你要能说服大家为这个目标努力。

有一个相关的学习方法历经岁月的考验：对话。对话有时被理解为纯粹的乐趣。耶鲁前校长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写道：“对话是人类最古老的教学方式。”对话是“一种伟大的创造艺术，它把情感翻译为理性，它让不同的人分享最深处的想法和理念，文明由此而造就”^[64]。科学家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曾说：“除了对我们的专业培训所必需的书本知识以外，我受益最多的就是好的对话。幸运的是，我从不缺少好的对话者。”^[65]所谓的开放式办公室，可能也有这个目的，可以不分时间鼓励正式和非正式的交谈对话。对我来说，进行人物访谈，和同道、朋友交换意见，在编审会议上各抒己见，都是学习的重要渠道。

这就说到人文教育的第三大优势：它教会你如何学习。我从大学和研究生院所学到的不仅仅是特定领域的事实和知识，更为影响深远的是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我学会了如何精读一篇文章，搜寻新的信息

源，让数据来说明或者反对一项假设，觉察作者的先入为主之见。我学会了快速浏览一本书，以得到其精华。我学到了怎么问问题，展示对立面的观点，做笔记。这年头，你还要能使用计算机来观看演讲、访谈，学习在线课程等等。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智力的探索。

论 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大学里学到的专业知识等毕业后，到了真正的职场，恐怕难有太多实际的用途。即便你的专业是对口的，但是学校里所学的很快也会过时。十年前你学到了如何为计算机编程，但现在的世界充斥着移动设备和应用。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不变的是你获取的技能 and 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所有的领域都在不断推陈出新，你也要不断面对新的挑战。学习，然后再学习；制造工具，然后再重新设计其用途，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步骤。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指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大家提供“第六份工作，而不是第一份工作”所需要的技能^[66]。

至少有 人有多元智能，不必局限于一隅。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人有八种智能^[67]：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身体动作智能、自然智能、自明智能和人际关系智能。为了更好地适应今日之社会，学生有必要体验多种学

习方法，以培养上述多种智能。美国松散和开放的高等教育环境恰恰是提供这类试验的理想环境。加德纳写道：“在我这一行有个笑话说，最好的幼儿园在法国，学前班在意大利，小学在日本，中学在德国，而最好的大学呢，就是在美国。”^[68]

奈

托马斯·切赫（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是格林内尔学院——一个典型的人文学院的毕业生。他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个运动方面的类比。运动员要进行自己项目之外的练习，所以学生也要了解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交叉训练对关键肌肉群的助益，要胜于把同样的时间花在仅仅锻炼自己特定的运动项目上，”切赫写道，“同理而论，让科学家在人文领域进行交叉训练，反而能提高他们在科研方面的能力。这种学术交叉训练能培养学生收集和整理事实、观点的能力，学到如何分析和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如何表达一个观点等等。要培养这些能力，光是写实验报告显然是不够的。”^[69]

加德纳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学生将会越来越多地侧重思考方法。说到底，大部分事实都可以用谷歌搜索到，没有必要占用脑资源来记忆^[70]。他指出，最好的思考往往在不同的理念、领域和专业发生碰撞时出现，在不同文化发生冲突时出现。因为这个原因，他比我更反对好书精读的学习策略。教育的目的，在

在他看来，不是往学生的脑子里塞满旧家具，而是帮助他们获得关键的知性技能，以打造自己的新桌椅^[71]。他提倡科目表的多元化，让学生领略到不同的思路：观察性的、分析的、美学的、基于团队的等等（听起来和耶鲁-NUS的项目很像）。从其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知识出发，加德纳断言：“这种向后看的教育无视我们现在对大脑建构和处理知识的理解，几乎就是玩忽职守。”^[72]

技术和工程涉及对观念和思想的深入探索，这些探索往往被其实用性所掩盖。技术本身大有迷人之处，不能让你发财致富是另一码事。我还记得七十年代时在印度第一次见到计算机时的震撼，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将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新产业。那时候，我学到的计算机编程涉及到现在早已不用的FORTRAN语言和穿孔卡。即便是在这种笨拙的格式下，计算机的惊人能力还是毋庸置疑的。能够学到这么新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从那时起，计算机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但是信息产业的巨大财富让我们忘记了计算机给人们带来的智力乐趣。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计算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公司，但是它也把我们带入前所未有的知识领域。不管这些知识造就了多少亿万富翁，它本身已经是激动人心的知性旅程。计算机技术对头脑的本质做出了深刻的探寻，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把科学划归为

哲学的一部分。

技术本身是人类聪明才智的极好体现，但没有必要为了颂扬技术而贬低人文，而这恰恰是今日之现状。工程和艺术史没有孰优孰劣，一个健全的社会两者都需要，而且是同时需要。史蒂夫·乔布斯在为新的iPad揭幕时说：“苹果公司的DNA里就有这样的信念，光有技术是不够的。技术要和人文艺术结合，才能创造出真正赏心悦目的产品。”^[73]

这个结合不仅仅是在技术之上增加一点设计。以脸书为例。马克·扎克伯格原是个典型的人文学生，只不过恰好也对计算机特别感兴趣。他上高中的时候对古希腊特别着迷^[74]，上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心理学。脸书能有今天，固然有技术的功劳，但心理学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在访谈和座谈中，扎克伯格常常指出，脸书诞生之前，人们往往不愿意在互联网上暴露自己的身份。互联网那时是一个无名的荒野。脸书的创举在于建造一个实名的网络文化，一旦人们愿意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暴露给朋友，这个平台就成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契机。当然，扎克伯格也~~也~~对计算机有深入的了解，他~~他~~雇佣了一流的程序员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但对人心的了解乃是他成功的关键。用他自己的话说：“脸书既是技术，又是心理学和社会学。”^[75]

并

技术和人文教育在今日商务上携手并进。二十

，而

年前，一个技术公司也许可以单凭工业产品的制造而生存。而现在，一流的工业设计、市场营销和社会网络营造都不可或缺。很多公司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因为制造业日益变得商品化了。制造一双运动鞋，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到。但这双鞋要卖出三百美元的价钱，后面没有一个故事是不行的。汽车、服装、咖啡，都是一样的道理。附加的价值在品牌里——品牌需要被构思和呈现，要能打动人，还要能有持久的价值。创新专家布鲁斯·努斯鲍姆在2005年《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所知道的知识经济现在正被另一种东西取代，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创造力经济。对于公司来说曾经的核心问题——价格、品质，和大部分涉及左脑的、分析性质的知识，正被转移到低收入高培训的中国和印度的加工厂，转移到匈牙利、捷克和俄罗斯。与此同时，新的竞争焦点是创造力——右脑的那些东西——聪明的公司现在要从这上面谋求最丰厚的利润。这不再是数学和科学的天下，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归根到底——革新能力的天下。”^[76]

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奥托尔曾仔细研究技术和全球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他写道：“最容易被计算机所取代的人类劳作是那些服从明确指示，可以被变成代码的步骤——譬如乘法——在这方面计算机在

速度、质量和成本效应等方面全面超过了人类劳力。而难以计算机化的那些工作是需要灵活变通的，需要应用判断力和常识，这些工作涉及的技能不能简单变成代码。譬如，提出一个假设，或是整理衣橱。一旦涉及这类工作，计算机就变得比一个学龄前儿童还不如。”^[77]我不是要否认技术培训的必要性，但我们和计算机一起工作——未来所有工作都属于此类——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分工：最有价值的工作是那些只有人才可以胜任的工作，那些计算机（哪怕是暂时）还不能取代的工作。

奥托尔把就业市场划分为三个部分。一篇《快公司》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他的研究成果：“在市场的低端，存在一个增长的服务业板块。这个市场需要人在不可预见的环境里亲力亲为，譬如开车、烹调、照顾小孩或是老人。这是不可能外包或是被技术取代的项目。”^[78]中间的一个板块是由白领但是程序化的工作构成。这些工作涉及信息处理、填表、查找事实、数据录入和简单的数据分析。保险业、银行业和法律界常见的白领工作正在被机器日益取代。“在市场的顶端有一些工作是人人都想要的。你猜怎么着？”据这篇文章的作者来看——他也许比奥托尔更为乐观——“这恰恰是美国的教育系统所培养的学生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它们要求的是创造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决策力、辩论和管理的能力。”硅谷的风险资本家维诺德·科斯拉认为机器将取代很多人类工作，但即便是他，也认为那些涉及复杂创造性、情商和价值判断的工作将始终属于人类^[79]。

再说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同时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产业——娱乐业。2012年一份题为《不断拔高的天际》的报告指出，即便是在经济萧条或恢复期，所有跟娱乐有关的行业都保持了向上的发展趋势^[80]。1995年到2009年间，世界电影（剧情长片）的出产量翻了四倍还不止。而从2008年到2011年的三年间，美国玩视频游戏的人数翻了二点五倍。即使在2008年和2010年的萧条期，书籍出版业也有百分之五点六的增长。音乐、电视……这个板块的所有产业都在上升。这是一个在全球雇佣了上百万人、不断增长、丰富了经济和文化的产业。娱乐产业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故事、影像、文字、歌曲。这些艺术的元素常常和技术的元素混在一起（比如《指环王》和《冰雪奇缘》里的计算机特效）。不管这些影片是怎么制成的，很显然娱乐产品需要人文艺术的背景和特殊技能。

所以说写作、音乐创作、设计和艺术是有价值的。但是艺术史呢？对奥巴马总统以及很多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来说，怎么解释像艺术史和人类学之类晦涩的学术领域的价值？当然，奥巴马总统是要强调数

百万普通美国人的处境，对他们来说，寻求基于技能的培训比人文教育似乎更现实。也许这些人需要学习的是一项专门技能，而不是那些听起来神乎其神的“商务”专业。但那些对艺术史和人类学真正感兴趣的人，愿意坚持在这条道上走下去的人，这个世界对他们也不是没有任何补偿的。这些领域要求深入了解好几门语言和文化，要求有在外国工作的经验、审美的眼光和把一种文化和媒体翻译介绍到另一种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今日的全球经济气候下是有价值的。霍华德·加德纳的研究指出，这种经历让你训练自己多方面的智能，使你变成一个更有创造力、更觉知的个体。

以耶鲁医学院的欧文·布雷弗曼为例。1998年，当他在一所附属医院教授年轻的实习医生时，布雷弗曼医生发现他们的观察和诊断能力颇有欠缺。为此他想出了一个新奇的举措：把他们带到画廊里，让他们和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的琳达·弗里德兰德一起为一百个学生设计一个视觉指南。他们让学生仔细观察绘画作品，分析其多个层面的细节，表达它们的含义。布雷弗曼发现，经此一役，这些学生的诊断能力有了显著提高。这个办法是如此有效，二十个其他医学院也纷纷采纳^[81]。

这也许听起来像是某个教授异想天开的特例，但

数据表明，迂回思维和并行思维在工作中有它的价值。2013年的一份美国大学和学院联合会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四的雇主认为人文教育是针对当前的全球经济最好的教育^[82]。学生毕业后，那些取得工程学位的一开始薪水比较高，因为他们的技能可以被马上应用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人文教育的学生后来又取得一个专业学位后，工程师和其他职业的薪资差别逐渐缩小了。事实上，一份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些人文学院的毕业生比起其他学院的同龄人，更容易取得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83]。这也许要归功于人文教育所培养的好奇心和对学术探险的胃口。如我所说，人文教育提倡学习科学，是因为它带来的心智愉悦，而不是它的市场价值。这种认识的长久效应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迟早会显露出来。

诺曼·奥古斯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总裁）同时强调科学技能和人文思考的重要性^[84]：

所以说商业从我们的教育系统里能得到什么？一个答案就是更多的科技人才……但这不是全部的答案。人不能光靠等式活着。我们需要懂外语，了解经济、历史和地理的员工。一个技术主导的经济需要有伦理的基础……

毫无疑问，当面临人生的重大决定时，我们的领袖们、政府的官员们、公司的首脑们，是不是需

要借鉴古往今来伟大的哲学家、作家和剧作家？他们所呈现的种种疑难对我们有没有启发？我的回答是一个响亮的“是”。

施格兰公司前总裁埃德加·布朗夫曼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他对追寻商业成功的学生有一个忠告^[85]：

拿一个人文学位。在我的经历中，人文学位在造就一个人方面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不仅让别人对你产生兴趣，也让你自己对其他人产生兴趣。这些人对你未来的道路有决定性的作用。

年轻的商业领导人要做出大量的决策，不论这些决策是基于理论或是事实，基于需求或是渴望，基于数字还是推测，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评价从人和数据表格那里来的原始信息，并做出有根有据的关键性决定。

列举众多首席执行官的意见也许只能算是道听途说。全球经济竞争的大图景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人文教育能和被亚洲国家所推崇和完善的科技教育相媲美吗？

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现代经济所需成人技能的评估^[86]。评估包括三个方面：读写能力、数字能力和技术掌握能力。美国在这次评估中成绩很差，读写和技术能力都低于平均数，数字能力则是倒数第三名。这个测试评估的是解

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比方说，技术能力的测试是让被测试者把计算机文件分类整理到文件夹里。最可怕的是，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美国人在数字和技术能力测试中竟然是倒数第一。

这个结果和更低年龄段的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智力水平（毋宁说是这方面的欠缺）倒是颇为相称。从2000年开始，每隔三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会安排科学、数学和阅读方面的标准测试。最新的测试称为国际学生测试项目（PISA）^[87]，于2012年进行。在测试所涵盖的三十四个国家中，美国的数学、科学和阅读成绩分别排名第二十七、二十和十七。平均下来美国的总成绩排名第二十一，落在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后面。

~~但有一点很奇怪。~~美国在这类国际测试中从未取得过好成绩^[88]。1964年，名为“第一国际数学研究”的测试针对十三岁的孩子，在十二个国家展开。平均来说，美国的成绩要显著低于九个与其相似的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更差^[89]。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对数学和科学能力的多项研究继续显示美国学生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学生。美国不至于每次都垫底，但少有能取得中等偏上的成绩。最近的一次这类测试称为“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TIMSS）^[90]，于2011年完成。这次美国的成绩大有提高。在测试所包括的五十个国

家里，美国四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分别排名第十一和第十七。至于八年级的学生，在四十二个评估的国家中，美国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分别排名第九和第十。但是这个TIMSS测试更侧重重复学过的材料而不是抽象的问题解决能力。

总的来说，美国的测试成绩令人失望。尤其考虑到美国在教育方面的人均花费高于所有其他国家^[91]。但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辉煌成就？为什么亚洲的众多测试高手们没能变成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作曲家和商人？这些亚洲国家的测试成绩虽高，但是他们的创新能力（到目前为止）好像并不是很高。

这里似乎有一个谜题：

很多年以前，我和当时的新加坡教育部长尚达曼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新加坡在这些国际测试中一向名列前茅，但是其测试高手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貌似还需要提高。尚达曼说：“我们都奉行精英教育，但你们的侧重才能，我们的偏重考试。有些能力是没法测试的，比如创造力、好奇心、冒险精神和野心。最重要的是，美国有一种学习的文化，鼓励质疑现存知识和挑战权威。这是新加坡必须学习美国的地方。”^[92]

耶鲁大学NUS之所以开在新加坡，恐怕就有这个原因。但有这种认识的不仅是新加坡^[93]。首尔国立大

学和延世大学已经扩展了有关人文教育的科目。在日本，东京大学也有类似的举措。2004年，早稻田大学新开设了一个国际人文研究学院，虽然到目前为止上述动作还未见显著成效。印度悠久的人文学院传统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时期和独立后的时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些人文学院都没有工程类学院的地位显赫，其运营也比较官僚（它们事实上就是政府机构）。近年来，某些著名印度商人设立了新的面向人文教育的高等学府，譬如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和马轩德拉世界联合书院，意图一扫旧的风气。除此之外还有2014年刚成立的阿绍卡大学和纳兰达大学，复兴了印度的古典哲学、科学、伦理学相结合的传统，并引进了现代的人文和科学形式。

要说到今日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之外可能就要算瑞典。在硅谷之外，所有最新的高科技公司貌似都在瑞典，然后还有以色列。丹·塞诺和索尔·辛格的《创业的国度》详细描述了这个国家的高科技企业。以色列的创新性是有事实证明的。从国民生产总值里风险资本的比例来看，以色列位居世界第一。美国是第二位，瑞典居第六，英国和德国都排在后面^[94]。2014年的一份彭博报告计算出高科技企业在所有上市公司中的比例：美国第一，瑞典第五，以色列第十。如果单考虑国民生产总值中科研和开发的比

例，以色列排名第一，瑞典第四，美国第十^[9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在PISA排名表都没有取得好成绩。瑞典和以色列在2012年的测试中甚至比美国还差^[96]。三个项目平均下来，瑞典和以色列在三十四个成员国中分别排名二十八和二十九。那么是什么让这三个国家如此相似地差在测试上，而强在实际的创新产业上呢？有如下一些因素：所有三个国家的工作环境都不讲究等级，而是讲能力。他们像年轻的国家那样运营，充满了能量和活力。三个国家都是开放社会，拥抱全世界的想法、商品和服务。最后，这三个国家的人民都充满自信——这其实是可以测量的。PISA测试不仅评估学生的能力，也评估学生的自信心^[97]。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我概念”。比方说，学生要对自己的数学能力有一个评估。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学生的实际数学成绩排名分别是第二十七和三十，但他们对自信的信心名列前茅。瑞典的自信排名第七，虽然实际的数学成绩排名第二十八。

我还记得九十年代时第一次读到这个实际成绩和自信之间巨大的差异。当时，里根政府的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就此自嘲说：“这个国家教自尊比教数学要强多了。”^[98]这话听起来好笑，但仔细咀嚼之下似有深意。美国、瑞典和以色列学生近乎盲目的自信其实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他们挑战长者，开创

公司。当别人觉得他们错了，他们可以坚持自己的道理，就算是失败，也不轻易气馁。虽然说自信过头了就是自我欺骗，但相当程度的自信是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素。蔡美儿和杰德·鲁本菲尔德所著《三重包裹》一书写道，某些业绩优异的少数民族具备一种奇怪的心理素质：一方面极为自信，一方面又有极强的不安全感^[99]。美国对自己的衰落无休止的担忧，以及以色列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恐惧，和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莫名的自信一起来考虑，可能就是把这个现象放大的结果。

教育测试结果和经济业绩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个有广泛争议的话题。对教育改革的辩论也免不了提及这个问题。有些专家认为这两者完全没有关联^[100]；另外一些人则提出了相反的证据^[101]。我个人认为，在其他因素同等情况下，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国民肯定是件好事。美国的教育系统需要很多改革，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需要参与，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香港之外的亚洲四小龙和现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证明了测试成绩和经济成果之间存在关联。但是增长和革新由很多因素构成，有些因素完全在测试和技能的领域之外。

美国的劳工培训总的来说不够，这绝对是一个劣势。但它也有几项优势：非常灵活和蓬勃的经济、强有力的法律、很好的调控机制、优秀的科研大学、富

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生机勃勃的企业家文化。所有这些因素足以补偿测试成绩的平庸。相反，日本的劳工培训极为成功，但它的很多经济和文化指标都颇有不足，特别是企业家文化和等级社会。测试成绩好，并不能造就下一个谷歌。

美国还有一项优势，就是能吸引全世界最聪明和能干的人才。它吸收了众多的移民，这些移民很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干劲十足。这些人当中的优秀者创建了新的公司、产品甚至产业。硅谷所证明的，就是少数人也可以对经济有大影响。学者海纳·林德曼和詹姆斯·汤普森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它智商最高的百分之五的国民有密切联系^[102]。据杜克大学的乔纳森·韦研究，美国最优秀的百分之一人口（大约三百万人）对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03]。

这就是说，美国虽然原材料不行（劳力训练不够），但活儿干得特别好。日本呢，虽然原材料一流（优质劳力），但活儿干得一般。韩国、新加坡、瑞士和某些北欧国家则两方面都强，所以它们的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它们经济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它不仅促成强有力的增长，也造福于普通人。换句话说，美国有很多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很多谷歌、脸书来带动普通人。但是最优秀的一群人和少数几个技术大腕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收入的提高。在

这方面，东亚以及北欧的全面良好教育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有一个著名的论调，就是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不平等，只有高税收才能缓和这个矛盾。然而在他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中，皮凯蒂也承认，从长远来看，抑制不平等的最佳途径是普及良好教育。他写道：“在大尺度的时间范围内，最能够促进平等的就是知识和技能的散布。”^[104]

东亚的经济增长让很多国家都想模仿它们的教育系统。但是跟美国一样，亚洲的经济增长也有其他原因，譬如勤劳。PISA2012年的测试结果就是这方面的证据。平均来说，上海的学生全面胜过所有国际学生，他们比美国最强的、来自麻省的测试者还要领先两年^[105]。上海这种惊人的成绩背后有什么秘密武器？他们教数学有什么诀窍？是不是中国人学数学有什么特别之处？答案也许没这么复杂。根据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的计算，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比美国学生一年要多出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到十五岁参加测试的时候，学生已经上了十年学。因此，考虑到美国的学校一年上一百八十天，一个十五岁的上海学生比麻省的同龄人要多上了两到三年学^[106]。他们数学上领先了两年，不为别的，因为他们事实上就是多学了两年！这不是中国基因或更好教育系统的问题。没有

更好的配方，只有更多的练习。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说的，不管学什么，要真正达到炉火纯青需要一万小时的练习，那么东亚学生达到这个目标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美国学生，怎么教那都是次要的^[107]。

美国不应该盲目照抄亚洲的教育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基本上还是基于死记硬背和应试技巧。我自己经历过这个系统，它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创造力。中国的互联网大腕，阿里巴巴的马云，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问道，中国人的创造力为什么不如美国人和欧洲人？他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系统基本功很扎实，但是并不培养一个人的全面智能和创造力。它应该让人自由地探索和试验，享受求知的快乐。他说：“只有当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和体育）后，革新才能变成一个规律。很多画家学画是出于乐趣，很多文学和艺术作品都是在这个乐趣的前提下产生。所以说，我们的企业家也需要学习把乐趣带到工作中来。”^[108]

亚洲的系统教你勤奋工作、牢记考试所需的知识，并能在压力下完成工作。这些都是无价的技能。美国今天的问题可能很简单：学校太轻松了。这个观点适用于所有学校，不仅仅是少数最优秀的学校。即便是在这些精英学校，学年比世界其他地方也要短得多^[109]。在很多层面上，美国的大学现在也颇为松

懈。成绩膨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一份2010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大学学生每周平均的课外学习时间从1961年的四十个小时降到了2003年的二十七小时^[110]。

最近的一项重要调查试图从问卷、成绩单和学习评估多方面了解美国一流大学究竟教学生什么^[111]。答案令人震惊：没教什么。《随波逐流的学术》的作者理查德·阿鲁姆和约瑟帕·罗克萨这样总结他们的发现^[112]：

大量的四年制大学学生所经历的是有限的学术期望，他们的努力只能算半心半意，因此在独立思考、复杂推理和书面交流等方面的客观衡量标准下只取得有限的进步（或完全没有进步）。我们的抽样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上学期没有选过一门需要写超过二十页论文的科目；三分之一的人上学期没有选过一门每周需要读超过四十页文章的课。在我们的抽样调查中，一个二年级学生每周学习的时间平均只有十二小时。这里面有三分之一是和同学在一起。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学生每周花在自己独立学习的时间少于五个小时。这些数据不仅对高年级也适用，还和其他针对学习投入的相似研究吻合。大量经验数据表明，近几十年来，大学学生在学习上所花时间呈下

大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的非职业体育项目。这些项目消耗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注意力。很多大学基本上就是几百万美元的体育运动队，而教育只不过是附着在这上面的一个小小的部门。某些运动项目，特别是美式足球，对学生的大脑显然有系统破坏作用。然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指出，这些所谓的致力于提高学生脑容量的机构对这些损脑活动不但积极拥护而且不断从中获利^[113]。这么一来，学术工作的规范和价值显然要受到损害。

很多大学里的核心公共课——也就是人文公共课——已经变得松散。这也是为什么雇主们对所谓的英语和历史专业抱有疑虑。与此相反，社会科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在雇主心目中的可信度有所提高。这些科目还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中点。当然，最能打动雇主的不是某个科学的专业，而是科学学位本身的严谨和规范性。他们知道一个学物理的不太可能把他量子物理方面的知识用到贸易上。我哥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数学专业，然后去了华尔街搞金融。他觉得，他所受到的本科教育并没有提供任何优势，任何一个人文专业的学生，只要能懂基本的算术，也一样能行。

人文教育目前存在很多弊端：松散的结构、工作量减少、标准降低——但这些都是实施的弊端，而不

是这个教育模式本身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不是大家都去学什么市场营销，而是要让人文教育更规范、更严谨。如果你主修一个人文专业，应该有一系列的必修课，就像是经济学那样。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职业道路做出最佳准备。很多公司看好大学运动员，因为他们知道运动员自律，已经养成了规范的训练和工作习惯。要想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必须要养成这些好习惯，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其他人密切合作，最好还有点运气。不管你的专业是英语、物理，还是历史、工程、商务，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八十年代末，有一种认识（毋宁说恐惧），认为日本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最创新的国家 and 最有活力的社会。在这个认识达到顶峰的时候，记者詹姆斯·法劳斯在日本待了几年时间，以便了解美国如何应对这个“冉冉升起的太阳”。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学习日本。也就是说，不要效仿日本社会所特有的基于自我牺牲、无所不能的政府官员和巨型产业政策调控的结构。他的建议，如同他的书名所说，是《更像我们》^[114]。这意味着不仅强调美国特有的力量：开放性、革新、非中心化、自由放任的态度和企业家文化，而且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这些优势发挥到极致。对人文教育的问题，也许我们也应该有相似的态度：不是放弃，而是更多、更好。

第四章

自然贵族

虽然没有当上总统，但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重要的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在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帮助起草了《独立宣言》，随后又成为立宪委员会的成员。他在革命时期担任驻法国大使，取得了法国对美国的重要财政支援。但富兰克林在美国历史上的形象不仅仅是其政绩所能概括，他所代表的是一种美国特有的人物，也许就是美国精神的象征——白手起家，风云天下。富兰克林家里有十个孩子，因此他只受过两年正式教育，到十岁就结束了。七年后，他离开波士顿的家前往费城闯天下。他对公众事务的关注，对商业的敏锐，对技术的执迷和社交才能，让《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称他为“我们的雅皮奠基人”^[115]。沃尔特·艾萨克森在他关于

富兰克林的传记中写道，富兰克林“在我们的信息革命时代也是毫不落伍。我们很容易想象和他一起下班后去酒吧，给他秀一下我们最新的数字设备，征询他对一个新投资计划的意见，谈论最新的政治丑闻或是政策变迁”^[116]。富兰克林的魅力，在于他既聪明，又识时务，兴趣广泛，尤其注重万事万物内在的机理。

听起来，富兰克林正是鼓吹“辍学办公”的那号人。他上的学里面唯一有点用处的，可能就是他在印刷厂做学徒的经历。但奇怪的是，富兰克林~~对教育的需求相当广泛~~。1749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宾夕法尼亚州青年教育提案》^[117]。在这里他为在宾州建立一个新的学院制定了一系列规划。富兰克林认为教育应该为我们在真实世界的职业生涯（政治、法律、商业）导航，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年轻人能接触到“知识的伟大轮廓”^①。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真正的品德”，也就是说个人能力和为“家庭、朋友、国家和人类”贡献自己力量的意愿。

富兰克林希望学生住在学校里，甚至还特别指出学校应该有一个花园、一个果园、一片草地、“一两块竞技场”。他们应该“节俭”地住在一起，并经常运动，以便“让身体保持活力”。富兰克林所建议的

① 当时，如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教育推动者，认为教育是年轻白人男性的特权。——译注

学习科目既广泛又多样：数学、天文、地理、宗教、农业、历史（法律的、民俗的、自然的、道德的，不一而足）。他特别强调学习英文，而不是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认为重心应该放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上，因为在现代世界里，书面通讯比口头通讯更为有效。真不知道他对今天电视和互联网的冲击又作何感想。

十八世纪富兰克林所展望的学校，基本上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人文学院。富兰克林当年为把他的想法付诸实现费尽了力气^[118]。他的小册子启动了这个项目，但1751年学校真正落成时，保守势力把他的改革举措付之一炬。他帮助选定的学校信托人还是把拉丁文放在英文的前面。但是后来，这个学校变成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文学校之一。

富兰克林自己所受的教育并不多，但他希望其他人接受更广泛的教育，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成功有赖于对周遭事物强烈和广泛的好奇心，从海豚到月食，从电力到冷藏。还是二十一岁的时候，富兰克林创立了一个称为“俊社”（Junto）的俱乐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时事、科学和商业，有点像今天的研讨班^[119]。富兰克林一方面忙于实际工作，一方面也积极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缺乏正式教育，他仍然成为当时的科学名人，获得牛津、耶鲁和哈佛的荣誉学位，并被授予科普利奖（诺贝尔科学奖设立之前的重

要奖项)。谈到富兰克林的科学成就，艾萨克森引用哈佛的诺贝尔奖得主达德利·赫施巴赫的话说：“他在电学方面的工作是革命性的，可与牛顿、沃森和克里克的成就媲美。”^[120]

富兰克林把教育看作是为人类谋福利的手段，他的同时代人托马斯·杰斐逊为教育赋予了更紧迫的角色：民主的存亡。1778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立法委员会提出“普及教育议案”^[121]。他认为任何政府都有可能退化成专制暴政，而防范这个退化发生的最好办法，他写道，就是“尽可能地开启民智”。历史的经验教训足以构造一座强有力的堡垒，让人民知道如何抵御专制。杰斐逊一再强调教育对民主的重要性。卫斯理大学的校长迈克尔·罗思的《超越大学》一书旁征博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教育会建立一个不断加强的学习和公民意识的反馈圈子，有效防止政府滥用职权。”^[122]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杰斐逊提出一系列普及教育的举措，其中包括政府资助办学和在华盛顿建立一所国家大学。在当过国务卿和总统之后，他又回归对教育的热忱，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

1818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杰斐逊召集朋友和同事，要在弗吉尼亚的夏洛特城开办一所新学校。乔恩·米查姆在为第三任总统写就的传记中提到：“杰斐逊为这所大学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以至于学校被

称为杰斐逊先生的。”^[123]学校的方针是哲学与实践并重：要培养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发扬光大民主的宗旨，传授农业技术，扩展年轻人的眼界。他的科目表比富兰克林的要更为学术化，涵盖更多数学、科学、古代现代语言、法律和歷史、写作和语法等等。杰斐逊是最早推崇选修课的人之一，他认为校外的民主也应该用在校内，让学生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和富兰克林一样，杰斐逊的学校也是非教派的。事实上，弗吉尼亚大学的独特之处（至少是在当时）在于，它的中心不是教堂，而是图书馆^[124]。

他们都认为

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教育能确保新的共和国以才论人，出生、血缘和继承权都不重要。富兰克林自己是白手起家，一生都推崇那些凭借勤奋、才干和技能出人头地的人。他在商人、小型企业家和店主的崛起上看到的，是美国引以为傲的平等理念。杰斐逊的说法略有不同，他经常提到，需要创造一种“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这听起来像是要鼓吹“贵族院”，但实际上恰好相反。杰斐逊的“自然贵族”是完全基于才干的，要经常轮换，是基于出生、财富和特权的种种“非自然贵族”的反面^[125]。杰斐逊相信每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精英阶层，总有些人出类拔萃，但美国的精英应该是最优秀最聪明的那群人，是最好的教育的结果。“去芜存菁这件事，每年都

要进行。”他写道：“天降英才，不分贵贱，人才的种子如果不加以培养，就会无故流失。”^[126]美国应该好好利用这些天降英才。

对杰斐逊来说，实现真正的自然贵族有一个关键，那就是，穷人和富人应该有均等的教育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却常常强调州政府应该支付义务教育的费用，并赞助高等教育。他的主张不乏反对者，这些反对意见主要基于对大政府和高税收的疑虑。然而有意思的是，他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政治上的对手，保守党的约翰·亚当斯。“人人办教育，教育为人人，”亚当斯说，“教育的支出是公众的义务，每一块土地上都要有学校，这些学校不应该是有钱人的义举，而应该是人民的责任。”^[127]杰斐逊的担忧是，没有公共教育的系统，这个国家将会被一个特权阶层所统治，这个特权阶层将通过一个私有体制的网络来不断延续自己的特权。

这些国家的奠基人会怎么看待今天的美国？正如托马斯·埃兹尔在《纽约时报》上提到的^[128]，在那些最热门的学校，百分之七十四的学生来自于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家庭，只有百分之三来自于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即使是在最优秀的学生中，家庭背景也有巨大影响：从高收入家庭来的学生比低收入家庭

竞争最激烈

的学生毕业的几率要高出一倍。还有，一流大学入学的条件看起来好像是基于才能的（什么成绩啦，SAT分数啦，课外活动参与啦），但实际上都跟家庭收入挂钩。这个关联也许在测试方面不是很明显，但说到课外活动，人人都想去南非参加一个义务实习，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埃兹尔最后引用教育专家安东尼·卡内瓦莱的话说：“教育系统日益成为特权传宗接代的有效工具。”^[129]

半个世纪前，美国的中产阶级有一个良好的途径得到优质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伍军人法案”为一个全新的美国阶层敞开了最好学校的大门，它们的学费就算是中产阶级也能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公立大学蓬勃发展。1960年的时候，一个生活在加州的十八岁的年轻人可以在众多的加州大学分校中得到一流的教育——包括伯克利大学，它的很多院系在世界上排名前五——而几乎不花一分钱。事实上，那个时候一个加州居民在上伯克利或研究生院之前就已经上过世界上最好的公立中学，他从幼儿园到博士的整个世界级教育几乎都免费。直到七十年代末，伯克利的本科学费，如果是加州居民的话，在700美元左右^[130]。2014—2015年度，同样的学费（不包括食宿）涨到了12972美元^[131]。如果是非加州居民的话，还要加22878美元。根据伯克利自己的估算，若你

不是加州居民，住在校区里的话，上大学的总费用每年要超过55000美元。而且，和其他一流私立大学不同的是，因为没有捐赠的缘故，伯克利不可能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这一切导致伯克利今天的学生组成和四十年前大有不同。

伯克利的地位特殊，因为它的声望，还可以募集到一些非政府资金。大多数州立大学比伯克利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这些学校一度是通往中产阶级的高速公路，几十年来由于政府资助的不断减少和费用的不断上升，已经举步维艰。因此很多学校设立了所谓“派对通道”。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和劳拉·汉密尔顿的《付费派对》一书中写道，很多外州的有钱孩子因为可以支付全额学费，录取条件相对放宽，并能享受特殊专业、注水成绩单和一流设施。而低收入的聪明学生呢，则走在所谓“机动通道”^[132]上，没有任何特权。面临学术、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这些学生的退学率更高，就算最后能毕业，也要面临一大堆债务。

美国最优秀的大学渴望达到论才识人，实现杰斐逊所谓的自然贵族的境界。它们也确实为很多学生提供了奖学金，没有这些钱的话，这些学生是上不起大学的。但这些穷学生的数目还是太少。另外，现在申请一流大学的人暴增，因此录取率已经降到百分之十

以下，整个过程变得不可捉摸。雪上加霜的是，精英学校有很多特殊政策，为校友子女、少数民族以及运动员——这是最背离论才识人原则的——开放绿灯。一名曾在常春藤院校担任高级录取官的人告诉我：“我要推掉上百个完全满足条件的申请人，其中包括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业余运动员，因为我们必须招收大量校队运动员，这些运动员自己的体育专业很强，但其他方面相对较弱。”^[133]他说，运动本身综合了先天的才能和后天的训练，绝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出在这个招募机制上，因为它的竞争性，已经大大扭曲了教育系统。普林斯顿前校长威廉·鲍恩曾撰文有力指出，近几十年来，大学体育项目因为需要为校队招募运动员，已经损害了学校的学术水平^[134]。一位录取官对我说，运动员的SAT成绩可以比其他学生低一百五十分到两百分，其降低标准的程度远远超过传承录取和少数民族政策。一方面是这些校队运动员在课堂里绞尽脑汁，一方面是优秀的业余运动员对大学体育项目望洋兴叹。这个体制让校园脱离学术的宗旨。然而，没有哪个人文学院的校长敢提出不同意见。

加州政治活动家罗恩·昂茨在一篇2012年的论文《美国保守派》中提供了统计数据，说明这个国家的一流大学和学院过去几十年来对亚裔美国人执行了事实配给制。尽管申请人数暴增，学生成绩醒目，能够

得到录取的亚裔学生在所有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六点五^[135]。这个数字也许不完全正确——有两位常春藤盟校录取官对我说，他们的亚裔录取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很多人并不标明自己的种族，或是种族混合的情况）——但相对于这些录取标准含糊（说什么侧重“个性”或“全面发展”）的学校，加州理工和伯克利的亚裔美国人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四十。近年来，代表美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计算机、物理、生物竞赛和英特尔科学比赛并获胜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亚裔美国人。

一个学校如果都是奥林匹克竞赛奖牌得主，倒不见得是件好事。基于数字和测试的成就并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但有必要指出，学院有意识地采用种种看不见的门槛把英才拒之门外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杰尔姆·卡拉贝尔在他的《特选：你所不知道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录取内幕》中，用详尽的细节说明了这些藤校的主观甄选标准，像面试和课外活动之类的要求，是怎样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时逐渐成形，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大量录取犹太人^[136]。财富的优势，包括上私立中小学和参加奢侈的课外活动，已经扭曲了教育民主的理念。除非采取有力的措施，美国精英教育系统有可能和杰斐逊所期望的相反，最后培养出来的还是一个非自然的贵族。

从某个层面上来看，这些忧虑似乎是多余的。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它们的成功和声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人。现在人人都明白一张名校文凭的分量。后工业化的经济对那些具备学术训练和背景的人青睐有加。大学体育也是前所未有的有利可图。但所有这些都面临一个好景不长的问题：费用。上大学的平均费用以让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上涨：自1978年（有完整记录的第一年）以来，这个费用涨了百分之一千二百^[137]。这个速度是消费指数增幅的四倍、医疗费用的两倍。在这个几乎所有东西都不断贬值的时代，高等教育费用的直线上升无疑是现代美国生活的一道奇观。奇怪的是，少有人对此产生质疑。

对人文教育的种种质疑里，很多都跟费用挂钩。说白了，当我们质疑一个东西（衣服、汽车或教育）是否“物有所值”的时候，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别的，就是价格。人文教育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可以负担的，今天恐怕就很难说了。这意味着，一个家庭要做出选择，要么把钱花在教育上，要么省下来干别的。人常说数据表明大学学历能够提高终身收入水平，因此花一大笔也是值得的。这话是不错，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家长们为什么如此战战兢兢，生怕这个高价买回来的教育白白浪费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上，或是换回来的文凭卖不出去。说到教育，

我们现在常用的词汇不是“投资回报率”吗？

为什么上大学的费用上升如此之快？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和威廉·鲍恩提供了一个解释。他们认为，像教育这样劳力密集的产业不能用机器来取代人，也不能像其他产业那样扩展产品线^[138]。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生产力的进步使汽车装配的成本降低到以前的百分之一，但是要演奏贝多芬的C小调第四号弦乐四重奏，不管是十九世纪还是现在，你都需要四个音乐家和九分钟的时间。”^[139]在一个好学校的研讨班里，教授和学生的比例多半是一比十五左右。知识就是这么传授的，没办法改善。这就是为什么教育费用的上升要远超一般经济，因为后者可以有自动化，有海外转包代工之类的名堂来降低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要是你不介意听录音的话，享受莫扎特的四重奏几乎不花什么钱。但是现场体验就是另一码事了，不管是柏林爱乐乐团还是碧昂丝，赚钱的不是灌唱片，而是开音乐会。

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值得考虑。鲍恩指出，教育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很难估算的，学校的管理系统也许不够先进，学术质量对价格不够敏感，为达到最好的效果就应该尽其所能，不计成本^[140]。这话是没错，但也有可能美国的教育系统存在设计缺陷，它综合了市场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弊端。它和医疗保险有类似之

处：两者都是消费者需要一个产品，但无法评判其质量。你到底需不需要做一个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或是一个大学学位呢？另外，消费者自己并没有直接支付医疗或教育费用，至少不是全部。第三方的涉入，比如政府部门，常常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在时间表、价格信号和市场反应上纠缠不清。最后，教育的价值很难衡量。是不是只有大学学位才有用？或是某种更广泛的良好教育？这个良好教育又该怎么衡量？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已经克服了通货膨胀，但教育和医疗费用则以几倍于通货膨胀率的速度逐年增长。

衡量教育质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对一所学校的评判，通常是基于其软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等因素。这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入学学生的平均SAT成绩。但是录取时的测试成绩只显示走进学校的是什么人，不是走出学校的是什么人。藤校新生的SAT成绩很高，这说明它们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人才，但不表明它们能造就人才。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低SAT的学生在学校里有何进步。但如何评判这种进步呢？上一章所提到的《随波逐流的学术》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评估^[141]。通过“大学学习评估”测试，这本书的作者发现百分之四十五的学生在大学头两年根本没有任何思考能力的提高。其他测试表明后

来的两年也是同样的局面。为什么？如这本书所说，很多学校的功课很轻松，作业也少，根本不需要努力，结果就是没有收获。

如果说今日的人文教育有着种种问题，那么技术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教育总的来说是一个多少个世纪以来都缺乏变化的领域，我们今天学习的方式和古希腊人也没有太多不同：一个老师站在一群学生面前高谈阔论，再时不时让学生加入讨论。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信息技术革命对这个基本机制，对各级教育机构的基本运作都没有太多改进。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有了“慕课”（MOOC），也就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和其他在线教育系统有可能一起改变美国和全世界教育的面貌。慕课教学的方式是让学生看老师授课的视频，然后完成作业，再由计算机或人来评分。某些情况下，学生还可以通过特殊的聊天室和论坛进行虚拟课堂讨论。目前，慕课还不能提供正式的学分或是学位，但这一切将随着时间改变。慕课的想法很简单：一门课程在大学里充其量面向几百个人，但现在将面向来自全世界的上万名，甚至是几十万名学生。到2014年初，美国两个主要慕课平台的用户数量加起来达到了一千万^[142]。其中最大的慕课平台是Coursera，学生来自近两百个国家，提供近六百门不同专业领域

的课程。在普及教育的历史上，慕课是崭新的一页。很多大学对此都深表关注。

2012年，我参加了一个由《时代》杂志和卡内基基金会赞助的教育会议。我主持的那个栏目有四位著名高校的校长和吴恩达参加。吴教授是斯坦福的计算机科学家和Coursera（当时只有一年半的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演讲中谈到慕课的前景和他为百万人提供新的教育机会的雄心，谈到在线技术怎样极大地扩展了一门课程的参与者。用他自己的课程作例子，在斯坦福最多有五百个人上，但在线版的学生可以有上万名。他很谦虚，承认这个新的教育模式还在创立初期，需要很多调整。

现有的教育体系对此持极大的怀疑态度。所有的校长都表示出对新技术的疑虑，他们对观众（基本上就是其他大学校长）重申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校园、课堂和生活在同龄人中的体验是高等教育不可替代的基石。有一个著名大学的前校长提到：“很多学生报名了，但又中途退出。”吴教授同意说完成率不够高，但他也提到，斯坦福的普通课程完成率同样不够高。很多人上了头一两节课，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另一位参加者坚持说，明星教授的视频教学永远不可能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吴教授也同意，但他指出慕课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那些不可能参加美国大学研讨会的

众多学生。即便是在美国的大学，他指出，在大的公共课上老师和学生的沟通也很有限。总的来说，大家对吴恩达的理念敬而远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确切地知道这些大胆的理念肯定要失败，还是害怕它们真的变成现实。一份2013年的盖洛普调查报告^[143]和我的个人观感结论相似：只有五分之一的教授认为在线课程能达到真正课堂的学习效果。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似曾相识。我在《新闻周刊》工作了十年时间。这份刊物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出版物之一，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和数以亿计的收入。当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安慰自己说我们具备独一无二的优势，顾客依赖我们产品独有的特色，杂志业一向有这个挑战周期，我们曾经历风雨，这次也会挺过来的等等。结果呢？这次《时代》教育会议召开的当天，《新闻周刊》出版了最后一期（后来它又复活了，但发行数量有限）。对关注在线教育的读者，我有一句忠告：记住《新闻周刊》的命运吧！互联网已经多多少少改变了所有的产业，怎么可能止步于教育？不明白这一点，将来恐怕要栽大跟头。

不过众多教育者的忧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两份最近的研究表明，慕课的注册率和完成率实在不成比例：以两个最大的平台为例，Coursera的完成率是百分之四，而edX则是百分之五^[144]。媒体用这个低完成

率来证明在线教育技术的问题，来说明我们对慕课有过高的估计^[145]。但这是对数据的误读。要记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教育程度的学生都可以注册一门课程——选课完全没有任何门槛。所以说选课的人也很有可能不是全心全意。Coursera的数据显示第一周退出率很高，近百分之四十，但那些第一周没有退出的人里面，近百分之五十都完成了课程^[146]。另外，要知道选课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的百分之五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2012年和2013年，有大约四万三千人完成了edX最初提供的十七门课程^[147]。这相当于每门课两千五百二十九人，是普通学校最大课程的五倍。耶鲁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在2013年第一次把他的课程放到网上。那一年，选修并完成这门课的学生数量，超过了他在三十二年教授生涯中教过的所有学生的总和^[148]。

在线教育的潜力是不容置疑的。任何人，不论贫富、长幼、国籍，都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课程，学习那些他梦寐以求的科目。可汗学院是一个奇妙的在线平台，拥有三千个不同的视频，教授从代数、生物到历史的各类科目，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学习的理解。他们一个重要的新方法是“反教室学习法”，意思是学生自己在家看或听演讲，然后来到学校里，和老师一起探讨问题。这个方法更好地利用了学生和

较

老师的时间和能量：在家里自己被动学习，在学校里借老师的帮助主动学习。像很多伟大的技术革新一样，慕课和类似的平台将在教育的死水里投下一颗巨石，将迫使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因为他们现在要和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者竞争；它将给学校制造巨大压力，让它们降低成本，专注于自己的优势（是教学而不是体育），并寻找改善工作效率的新途径；它也会让学生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知识、文凭还是课题讨论？——并找到获取所需的最佳途径。最好的学校会面临更少的挑战者，这是因为它们提供一个独特的体验，更因为它们是在出售一个~~有价值的私人网络~~学习俱乐部的会员卡。新的教育模式将会崛起，比如密涅瓦计划，它是一个盈利性人文学院，没有昂贵的附加费用（譬如硬件设施和体育队）的精简版大学^[149]。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在线学习技术将会造就我们所不能预见的种种变化。慕课毕竟才三年的历史。

昂贵

一个随慕课而来的教学革新是所谓的“大数据”。当上百万的人都通过在线平台学习，提供这个平台的机构将获得巨大的学习数据。这些数据，一旦经过分析，可以促成教育革命。我们从来都号召因材施教，因为我和你的学习方法不同，理想的情况下，每个人应该有一个完全为自己而设的教育体制。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有钱人都是给自己的孩子请私人

教师。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萨勒曼·可汗在他的《世界大同校》一书里指出，今天的教育来自于工业时代的课堂模式。在十九世纪中期，当普鲁士决定为大众提供教育时，它是根据当时工厂的模式来办学校。学生根据年龄分班，然后被送到一个虚拟传送带上。他们被要求服从指令，不管好坏，学到什么就算什么，一直到毕业为止。其他的国家也采用了相似的模式^[150]。也许这就是那时教育大众唯一可行的方法，但这显然称不上因材施教。事实上，需要教育的人越多，教育就越不能针对个人的需求。

现在，这一切可以改变。大数据和强有力的分析程序让教育者了解到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老师可以密切关注学生上课的进展以及他们的表现。系统可以通过问答题之类的手段尽早得知学生对某些内容的掌握程度并做出相应调整，改变步调，并针对特定学生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考核手段。如果说成千上万的学生都没办法搞清楚某个问题，这就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个部分的教学需要改进。大数据对课程的调整和完善是一个有效的预警。系统

所以说，一门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的在线课程的结构好比一棵树，从主干出发，每个学生最后到达一个根据自身优劣势决定的树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理念，因为它改写了教育的基本规则。到目前为止，增

加学生人数都意味着降低对个别学生的关注。用工业界的行话来说，规模化和定制化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现在规模和定制可以和平共存，甚至互相促进。因为如果越多的学生选一门课，数据库就越大，而用来分析和定制个别学习体验的手段就越多，从而达到大规模的高效因材施教。

慕课和在线学习的最大潜力在于其最初的设想：普及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教育专家斯塔门卡·尤维利科-突门比科在2011年指出，全世界范围内就学于高等学府的一共有一亿六千五百万人。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这个数字会达到两亿六千三百万。但是要达到这个数字，目前的教育体系是不行的。“要增加九千八百万学生，意味着今后十五年里，每星期都要新开设至少四个大学（三万学生）。”^[151]这种增长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在中国，扩招政策导致了学生数目的快速增长，但教职员工和设施的增长明显跟不上。cousea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莱文说：“慕课发扬光大的地方一定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地方的上百万人除此之外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152]事实上，注册edX课程的学生，百分之七十二都来自于美国之外^[153]。

慕课的用户成分很复杂。大部分人都不是上大学的年龄，教育背景也参差不齐，但大多数人都有中学

学历^[154]。课程的组成既有专业培训，也有一般教育课题。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以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开设的三十二门课程为例，选课的学生有一半声称自己选课是出于好奇心，“纯粹是好玩”。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说自己是为了“获得某种特殊技能，以便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155]。换句话说，慕课的一大部分用户感兴趣的是人文教育，或是增强他们业已获得的教育。所以我们所跨入的新时代，人人都能得到人文教育的某些方面，但又没有真正经历一个人文学院的体验，也没有花费相应的费用。我说人文教育的“某些方面”，是因为住宿制度、课程研讨、通宵达旦的讨论和种种课外活动是一个完整的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能够成为最顶尖的那些学院——比方说世界前五名——之一员，就好比是加入了一个特权俱乐部，价钱贵些也是值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就不能只花一点点钱便享有某些人文教育的重要方面。如果说人文教育真的有价值的话——开放胸怀，为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做准备，培养自由的心态——那么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千千万万人能够享受到这个教育就已经是莫大的功德。

让我们回到那份2013年的报告，报告中显示选修在线课程的人半数以上都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职业目的。同样的现象也体现在各种成人教育课程书籍和视

频的激增。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会对有关艺术史、心理学或是物理方面的课程感兴趣？如果这不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学习这些究竟有什么用？

第五章

知识和权力

如果说无知就是幸福，那人类为什么想要知识？在西方文化中，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问题。普罗米修斯把火种从奥林匹斯山带到地球上，提供给这些凡人^[156]。这么做激怒了宙斯，把他永远锁在一块大石头上，让老鹰不断地啄食他的肝脏。这只是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至于人类，惩罚则来自于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这个盒子就释放出种种永远折磨人类的疾病、瘟疫、忧伤、嫉妒和愤恨。

知识大可比作普罗米修斯之火。在埃斯库罗斯的版本里，除了一根燃烧的树枝，普罗米修斯还给人类带来艺术、写作、数学、天文、建筑和医药的学问^[157]。换句话说，普罗米修斯从天堂里带给人类的，是一个人文教育的科目表——为了这个科目表，他和人类都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是如此^[158]。这个《圣经》的核心故事说的是知识的危险性。《创世记》里说伊甸园里有很多树，但是只有两棵树有名字，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知识之树。上帝不让亚当和夏娃从知识之树上摘果子吃，警告他们说吃了会死^①。而象征撒旦的蛇则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吃了不会死。上帝不想让他们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是因为吃了以后“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

亚当和夏娃最终还是吃了。上帝发现后，他的惩罚是无情的。他对夏娃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孕的痛苦”，然后诅咒女人永远被生产的痛苦所折磨。他对亚当说：“地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最后，这还不够，上帝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换句话说，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失足的结果，背负着原罪，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知识。

几千年以来，在西方的传统中，知识的危险性被一再重申。这实在是很离奇：一方面，这恰恰是西方在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方向上迈出的大步；一方面，
了

① 有人认为这棵树其实是服从的象征。但是如弥尔顿学者大卫·斯科特·卡斯丹在他的《失乐园》引言里提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它称为“服从之树”呢？知识之树的禁果绝对是这个故事的精髓所在。——译注

其他非西方文化里并没有相似的关于知识危害性的神话。也许其他文明里有似曾相识的故事，但绝对没有像普罗米修斯和伊甸园这样明白无误。也许正是因为西方的某种不可遏制的求知欲，导致了这种对其后果的恐惧。

“无知即幸福”这句话来自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格雷一首优美的诗《伊顿公学远眺》^[159]。在诗中，诗人写到他回到母校，高兴地看见“快乐的青山……洋溢着青春和欢乐”。他描述了天真快乐的田园景象，但随后又想到，一旦离开伊顿，这些年轻人将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种种困苦：恐惧、嫉妒、愤怒、绝望、贫困、死亡和“忧愁刺人的飞镖”。不知道这些现实，对他们来说还更好些。在诗的结尾他写道：“思考将毁灭他们的乐园，无知即幸福，智慧又有何用？”

然而，我们仍坚持不懈地追问并寻求答案，无视危险和困苦。西塞罗认为我们“为知识所吸引”^[160]乃是源自人类的天性。很多现代生物学家认同这个看法，因为作为一个人，就是要使用大脑。三百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这个举动把双手解放出来，并促成了脑容量的增长。脑容量成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理查德·道金斯解释道^[161]：

其他的物种也可以互相交流，但没有任何其他

物种具备真正的、语法开放的语言，没有任何其他物种有文学、音乐、艺术、数学或是科学。没有其他物种可以写书，制造像汽车、计算机或是联合收割机这样复杂的机器。没有其他物种可以把大量时间花在不直接促成生存和繁衍有关的事物上。

在歌剧和iPad还不存在的远古，我们的祖先把他们的脑力和刚从步行中解放出来的双手结合起来搜寻食物和制造工具。人类利用自己原始的智能来改造他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不像其他动物那样仅仅是被动地适应自然。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在他的《人的登场》中提到，人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生物……他不再仅仅是自然图景中的一个角色，而是参与到塑造图景这个过程中来”^[162]。人类寻求控制他们的环境，因此变成采集狩猎者、农夫和战士，最终建造了城市、国家和文明。

农业和建筑也涉及知识，但这是一种比较实际的知识。第一个试图抽象地理解这个世界的人是古希腊人。他们把这种探索称为“哲学”，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爱知识”。这不仅意味着了解人的天性，也意味着了解大自然的运作规律。后者被称为“自然哲学”——也就是所谓科学的前身。在对人的研究和对自然的研究之间逐渐出现一道鸿沟：前者似乎是软的，偏重臆测；后者是硬的，斩钉截铁。二十世纪早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说，人类的生活在不断改善。技术和医药的进步确实有它的阴暗面——核战争、环境污染、克隆人——但是近五百年来，知识的效果基本是正面的，近两百年来则是毫无疑问地造福了人类。在某种基本层面上，人类比以前更健康、寿命更长、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他们的组织方式也相对避免了残忍和不幸。

科学进步对人类的贡献可从以下例子中一见端倪。英格兰的查理二世是十七世纪最有权势的人之一，1685年他轻微中风后接受了十四个医生的一系列治疗（其实不治疗也多半会自己复原）^[165]。这些全世界最优秀的医生一开始对他进行放血。一品脱的血似乎不够，主治医生又在他的肩膀上开了一个口子，再放出八盎司血。不仅如此，他们还用上了泻药和灌肠剂。查理二世终于醒了过来，但接下来的五天里，医生对他不断进行放血和灌肠，要他闻打喷嚏的药粉，喝各种药汤，还在脚上涂满了鸽子粪。最后，他被强迫服下一剂号称“全国各类动植物的精华”的解毒药（根据他的医生的日记），一命呜呼。这，就是那个时候最顶尖的医疗手段。

在查理二世的时代，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这个数值直到1900年左右都没有太多改变^[166]。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岁，某些发达国家甚至更高。物质财富的积累达到了惊人的数量。2000年以前，

据联合国的估算，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贫困人口
的减少超过了之前五百年的总和^[167]。今天一个普通的
中国人要比五十年前富有四十倍、多活三十年^[168]。
中国的成就惊人，但并不特殊。1960年时，四分之一
的初生婴儿夭折，今天这个比例是二十分之一^[169]。
极度贫困（每天收入少于1.25美元）很有可能在不久
的将来被根除^[170]。

这些数据证明了科学知识的用途，医药、疫苗和
卫生极大地改进了人类生活的面貌。然而软科学和人
文科学也有它们的作用。人类之所以能更好地组织起
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促进生产力，这些行
为和组织理念固然要归因于不断尝试并总结经验，
但也要归因于人文科学提供了更好的猜测和洞见。社
会科学的实验品就是这个现实社会本身。

马特·里德利在他的《理性乐观派》一书中提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认识到交换——想法、产品和服
务——让人人都能从中受益。他也解释了专业化，也就
是分工的出现是怎样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产出^[171]。实
施这样的理念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许挫折、几
许失败。在《天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斯蒂芬·平
克做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年
代，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他强调某些理念的
出现对整个世界起到了积极有力的作用。比如，启蒙

时代的个人自由、自治和尊严的观念和一个“人文革命”的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结束了奴隶制^[172]。平克也提到最近的“人权革命”，认为它们改善了那些处于社会权利结构边缘的少数民族、妇女和同性恋族群的处境^[173]。

有些人文学者不以为人类在这些根本方面有任何改善^[174]。他们问，我们真的比古希腊人活得更好吗？答案绝对是肯定的，除非你是那少数几个古希腊贵族统治者之一（但即便如此，一旦牙疼，你还是想活在现代）。像奴隶制、农奴制、决斗之类的陋习和对妇女儿童的虐待在过去几个世纪都大大减少了，这是广泛的人文理念大行其道的结果，而这些理念正是人文教育的基石。毫无疑问，我们前面还有更多路要走，某些情况下，新的、变相的压迫取代了旧的、一眼就可以认出的那些。但这不能否认知识已经导向人类进步的根本现实。

四百年前，这个世界基本上被绝对君主制所驾驭，大部分人口只拥有极少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民主体制下，民主也有它的弊端，但总比过去无所不在的独裁要强。直到最近，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都被用来增加极少数精英的福利。十九世纪的非洲便是如此，整个国家被一小撮欧洲人变成奴隶劳工，榨取他们的经济作物。五十年代去殖

民化后，本地独裁者取代了外国殖民者，他们同样残忍，同样贪婪。今日的非洲仍存在独裁，很多地区被腐败所侵蚀。但这一切比起三十年前，或者是一个世纪前，已大有改善，在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兴起——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速度要超过发达国家——要归因于知识的传播。我访问发展中国家时注意到，不管什么地方，现在的运营效率要超过几十年前。这些地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几乎全部是西方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从芝加哥大学、乔治城大学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成归国后，就任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要职，并把他们学到的加以实践。医疗保险变得更系统、更深谋远虑，因为它吸取了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这些政策被更广泛的文化教育交流，如会议、出版物和电视对谈等所强化。这一切还谈不上完美，但已经比三十年前好很多。

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因为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曾说：“我们的研究对象自己会思考。”^[175]但是某些学术成果已经被应用到现实世界。政府已经开始采用社会科学的最优秀成果，尽管在政治和经济这样并非泾渭分明的领域，进步也有它的局限。每个前进的脚步都伴随着一系列意想不到

的后果。老牌工业国今天面临很多问题，但他们的雄心是前所未有的：为所有公民提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从来没有哪个政府要为如此多的人创造如此多的福祉。

知识也可以服务于某些可怕的用途。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组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某些知识转化为危险的意识形态。总有人追求权力并拿这些坏理念来充当他们追逐权力的借口，因此这些理念几乎总是权力角逐的烟幕弹。这不是说理念本身不能单独衡量，民族主义和宗教可以是社会强有力的黏合剂，可以让人振奋，甚至追求暴力。但历史上，这些理念不足以造就真正的成功，从长远来看对社会是不利的。围绕着这些坏的政治经济理念产生的政府需要高压、贿赂和暴力来维持秩序，这一切都不是长久之计。像纳粹德国或是苏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他国家反对它们。~~反对者们~~胜利了，部分是因为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力，因为它们的社会组织原则更优。~~这不是说美国在二战期间对德国和冷战期间对苏联的策略更优，~~胜利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能够比德国或苏联产出更多。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基于服从的社会，总体来说是和人的天性相抵触的。像~~一些威权国家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恰好是因为它虽然对很多事保有控制，但已在社会的某些领域实现了相当的自由和自

(譬如美国)

像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

也许更优，但

中国这样的

中国

治。然而，随着进一步开放，纳入知识和种种人文理念，拥抱交换——换句话说，就是人文教育所侧重的价值——维系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会越来越难。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指出，有三个人文理念对世界产生了正面的影响^[176]。首先是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警告，对一个唯一的、无所不包的真理的信奉不可避免会导向盲目，有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第二，他重申了约翰·罗尔斯的政治信条，那就是，最公正的社会是一个不论贫富出身或是个人才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社会，因为贫富和才能通常是基因和运气的结果，罗尔斯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个“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评价一个社会。最后，克里斯托夫强调了彼得·辛格的论述，他把我们对动物无缘无故所造成的痛苦提到道德的议事日程上来。这只是一些例子，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存在的很多理念，都以不同的方式代表着知识和洞见的增长，足以促进人类事务的进步。

他首先援引

当然，很多人读书、了解科学、体验艺术，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但我们当前的人文教育系统是在把年轻人向着好的方面改变吗？

为今日之~~年轻人~~辩护

青年

人文教育的一个持久福利就是它拓宽了我们的心胸。当汲取伟大文学的养分时，我们是~~是~~面对面地接触到一些自身生活中可能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的理念、经历和情感。~~当读~~历史时，我们遇到从不同时代来的人，从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教训。~~当~~研习物理和生物时，我们理解到宇宙和人类生命的奥秘。~~当~~倾听音乐时，我们常常被莫名地感动。这些不一定能帮助我们过上好日子，但它是生活的重要体验^[177]。在生活中，我们都扮演多个角色，~~包括职业的和个人的~~。人文教育能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但它同样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伴侣、朋友、父母和公民。

人文教育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吗？大学生肯定是把他们昂贵的优质教育看作是在现实社会取得

成功的必要准备。但很多人也认为，即便是最好的学生——有时候尤其是最好的——也存在致命的局限性。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这些人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职业，是一味追求成功的机器人。他们对了解自身、控制自己的激情或是完善性格缺乏兴趣，因此这一代人常被称为“自我一族”。《时代》杂志2013年曾有专刊报道这个问题，标题就是“我我我一族”^[178]。

2001年上半年，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为《大西洋月刊》写就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机构孩》，描述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学生、教授接触的经历。在文中，布鲁克斯写道，美国下一代领导者的日常生活规律是：“清晨就是团队操练，早上上课，住宿指导员值班，午餐，学习小组，下午课，辅导特伦顿的落后儿童，清唱练习，晚餐，科学实验室，祈祷，锻炼身体，再学几个小时”^[179]。这个单子看起来很吓人，但布鲁克斯发现，这一套强化活动表放在简历上固然有它的作用，但在增加个人的知性渴求方面却没有什麼帮助。对他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道德反省的彻底缺席，完全没有时间内省，或是构建自己的性格或美德。最后，他总结道^[180]：

在美国任人唯才的阶梯顶端有这么一群极端聪明、诚恳和勤奋的学生：他们热爱学习，成群结队；他们以巨大的热忱创建或是加入组织；他们有

责任心、安全意识，思想成熟；他们不觉得需要反叛——完全不需要；对于权威，他们没有一丁点的反抗心理，他们崇拜的就是权威；“疏离”这个词，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宇宙在他们眼中是慷慨、有序和充满意义的。在这些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学校里，我们看到的既不是愤怒的革命家，也不是意气消沉的懒汉，更不是冷冷的愤世嫉俗者，而是所谓的机构孩。

2014年，威廉·德莱塞维茨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批评，其结果就是他的《优质绵羊：美国精英的误导教育以及通向有意义的生活之路》^[181]一书。在此书中，德莱塞维茨谈到他在耶鲁教本科生的经历，这些学生终其一生都在为上精英大学做准备，但是一旦进了这些学校，就失去方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为得到一流的人文教育，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但拿到了学位，却不知道这学位能干什么用。结果呢，德莱塞维茨认为他们加入了一个特权阶级——他的原话是“自命不凡的小混蛋”^[182]——但全无智力和道德上的好奇心，对有关生活意义的大问题缺乏兴趣，也不愿意冒任何知性风险。他们是舒适的资产阶级，只关心成就，但对内在的自我和灵魂无动于衷。

说年轻人太浅浮，道德上不够严肃，这不是一件新鲜事^[183]。公元前700年，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已

经谈到这个问题。哲学家色诺芬和柏拉图对他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道德败坏痛心疾首。罗马人眼见之处，尽是道德沦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下一代的不够虔诚耿耿于怀。虽然美国人总和别人不一样——全新的国家，面向未来，自身就是现代性的试验品——但在这方面也没少发出哀叹。从清教徒到亨利·戴维·梭罗，从震惊于六十年代放纵的保守派到写就1979年《自恋主义文化》的克里斯托弗·拉什^[184]，大家对下一代对社区的漠不关心和对自身的迷恋都颇有微词。

最近一轮的批判始于1987年保守知识分子艾伦·布卢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185]。自那时起，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以同样的热忱介入了这场批判。布鲁克斯、德莱塞维茨和耶鲁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克龙曼^[186]都高唱同一首哀歌。但今天这些抱怨和以往反动分子的有所不同。几个世纪以来，年轻人面临的指责是太叛逆，太不尊重权威，而现在，问题变成了他们不够叛逆，太尊重权威。他们不愿意挑战成规，不管是冒犯艾伦·布卢姆的自由派虔诚，还是让德莱塞维茨不爽的保守思路。六七十年代时年轻人被鞭挞的原因是他们要摧毁资产阶级，现在倒是他们自己太资产阶级！看起来，是太多的年轻人心态太好，太有责任感，太喜欢工作。要是他们常常溜达出校园，进行密宗修行，抽大麻，读黑格尔，偶尔来两次示威静

坐，那他们的内心和灵魂肯定没问题了（当然，要是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你猜这些评论家会怎么说？）。有个可怜的二年级学生对我说：“我觉得不管我们怎么做，总会有不足的地方，大家就会大书特书。”

又不是他们创造了！

事实上，在当今的顶尖学校里确实有一个“成就文化”，这方面的描述还是比较中肯的。但是这基本上超出了学生的控制，用这个原因来指责他们，不是很奇怪吗？又不是他们设计了这个通向美国高等学府的强化测试系统，~~他们也没有创造~~这个忧心忡忡的经济时代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只要有一点点不完美~~，录取办公室就不会看你一眼。我曾经问一个藤校录取主管：“你们会收一个曾经有明显失败记录的孩子吗？”他马上回答道：“不会，这么一来他们肯定比不上那些更优秀的孩子。”我指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这方面的能力最能预示一个人今后成功的道路。这位录取官说他明白（他本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但他指出，如果他录取了这样的孩子——成绩单或是SAT成绩有任何纰漏——那么学校的排名会受影响，它相对于其他学校的胜负比（也就是说学生在收到两个录取通知时会选哪一个）会下降。这种竞争压力对学生存在，对学校也存在。学生如此应对，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种压力并不是一旦进学校就不存在了，暑期工

作、实习、奖学金，直到全职工作，一系列的标杆让学生不断冲刺。要被一个有名望的银行或是咨询公司雇用，学生需要通过马拉松般的面谈和测试，上千人争夺几个位置。面对这样残酷的竞争，某些评论家仍然认为，孩子们应该放松，追寻灵魂和完美的幸福？这话你跟高盛投资公司去说吧。

而且，~~这种一心追求成就的学生就我所知并没有~~让学生变成坏心眼、自私自利和残忍的人。这方面根本没有

任何证据。比起上一代学生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

心胸狭隘，~~他们甚至还好些。这些品质值得称道，尤~~

现在的学生是对。。而言其如果你是少数民族、妇女或是同性恋者。我也没少

在校园里和年轻人往来，我更觉得他们不但有思想，

不乏味，还颇令人振奋。斯蒂芬·平克教授有多年

大学授课经验，他也持类似意见^[187]。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个人意见，那有没有数据呢？事实上，有的。自

1966年以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院

(HERI)对刚入学的新生提出一系列问题^[188]。调查到的数据显示：四十年间，学生对挣钱的需求越来越明确了^[189]。但这个变化大部分发生在1967年到1987年之间，自那时起，新生中把“生活优裕”作为奋斗目标的比例已经相当稳定。在一个好工作越来越少，收入中值平平，各种曾经舒适的工作已被全球化和技术所取代的经济气候下，这算不算一个比较理性的回

也有人说这是政治正确性，但归根结底这些品质

应呢？在这种形势下，顾及到未来恐怕是高智商的表现吧。其他对学生来说也变得更为重要的目标包括“成为社区领导者”、“帮助困难户”和“对科学做出理论贡献”等等，这里面哪一个是自私自利的呢？

数据同时显示，今天的学生对世俗的追求是和强烈的行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志愿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和美国伙伴（Americorps）的人数有显著增加^[190]。2014年，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收到了超过五万份申请，很多优秀、成绩卓著的学生都选择首先服务于非盈利性机构^[191]。非政府组织变得很酷，这是因为今日之年轻人把它们视作一种有价值的经历，有些人甚至把它视为终身奋斗的目标。和积极参与政治或是志愿应征入伍的那些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们要行善，也要改变世界，只不过他们的方式更为实际，更注重方法，更讲究~~一步一个脚印~~——是麦肯锡的方式，而不是特蕾莎修女的方式。 **方式方法**

有别于“大学生”的，是所谓千禧人——就是出生于1980年到2000年的人。对他们的指控相似，但更难听。本章开始时提到的《时代》杂志封面文章（由其能干的幽默专栏作家乔尔·斯坦主笔）指责千禧人自恋、自大和懒惰（这是个新花样）^[192]。第一项指控被呈现为“冷冰冰的事实”。引用国家健康机构的

数据，斯坦写道：“这一代人中，二十多岁时患有自恋个性失调症的比例是现在六十五岁以上一代人的三倍。”^[193]但是如同记者伊丽莎白·里夫指出，这个数据是有争议的，它只说明年轻人比较倾向于自恋，而这种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所有人都是如此^[194]。里夫所引用的一项2010年的研究指出：“首先，我们发现，当把自恋的新数据导入业已存在的元分析数据中，大学学生的自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并没有增长。”^[195]至于说懒惰，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美国工人的基本问题，在于不论任何年龄段，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效率不断上升，但工资却保持不变。

2014年的一份尼尔森报告《千禧人：打破神话》提供了一些这一代人对志愿工作态度的数据^[196]。2001年，百分之七十五有过慈善捐助，百分之七十一参与过筹募活动，百分之五十七曾参与志愿工作。“这个比例超过了其他任何世代。”根据这份报告，他们最在意的三件事是：教育、贫困和环境。另一份也是2014年的，由凯斯基金会赞助的研究报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97]。百分之八十七的千禧人曾捐助非盈利机构，而这些人当中超过半数的人捐助数目超过一百美元。在一次解释千禧人的“TED”演讲中，市场营销专家斯科特·赫斯把他们和X世代相比。他认为，千禧人不仅不是“懒鬼”、“品头论足”、“反公

司”，而是“向前看”、“投入”、“包容”和“宽厚”。他们认为“商业”可以“被良心来润滑”^[198]。和他们之前几代人不同的是，他们不认为自己的父母是敌人，而是把他们视作朋友和帮手。也许，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就是父母，但这也不为过吧？

不论是千禧人、学生，还是年轻的专业人士，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针对年轻人的话，是他们都太注重自己。他们建立自己的脸书网页和推特，把自己吃喝玩乐的图片发得满世界都是。在2012年11月普林斯顿的一次演讲中，大卫·布鲁克斯赞颂了乔治·马歇尔将军的自我否认精神，马歇尔拒绝接受总指挥官（负责登陆欧洲的行动）的职位，因为他认为这只考虑到自己^[199]。这个故事我也很喜欢，但我认为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那个时候大机构——不管私营还是公立——主宰了个人生活。它们是如此庞大，可以照顾一个人整个的职业生涯。你的任务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把机构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团队放在第一位。作为报偿的是安定和成功（马歇尔随后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来是国防部长）。今天，人人都知道这个协定已经被打破了。任何东西都不再确定。你必须有创业精神，必须要意识到，一生中工作会换，职业也会换。没有哪个公司会对你一如既往，你也不能死守一个地方。领英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里德·霍夫曼

写了一部书，名为《你也可以是一个创业公司：适应未来，投资自己，改造职业生涯》^[200]，用来解释如何在今日的世界取得成功。最大的讽刺就是，~~这些~~敦促年轻美国人不要这么自恋的人，自己却忙着创建个人品牌、个人主页、脸书和推特账号。这对他们是好事，为什么对其他人就不是好事？

年轻人也有不愿意做的事^[201]。比方说，校园里的政治激进分子最近几十年少了很多——仅在第一次里根政权和奥巴马竞选时有所上升。但是学生对政治的冷淡反映的是一个更广的社会趋势。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都失去了兴趣，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变得两极化和功能失调，他们宁可在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但这只是手段不同，目的还是一样的：促成社会变化。鉴于目前的政治现状，政府的官僚主义和无孔不入的超级媒体，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

HERI调查报告中最惊人的一面也许是一个最广泛的问题^[202]：认为“发展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哲学”这个命题是基本的或是非常重要的新生，从1967年的百分之八十六降低到2013年的百分之四十五。这个数字可能就是布鲁克斯、德莱塞维茨和其他一些人极尽所能所描述的校园生活了，这个数字让他们感到忧虑，并怀念过去的时光。

我理解这种怀念。今天的学生谈起大问题来，没有以前的学生那么兴奋。他们不会侃侃而谈一些大而无当的哲学问题，不会彻夜讨论尼采、马克思或是托尔斯泰。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学生并没有创造这个精神，他们只是反映了这个精神。我成长的年代，冷战如火如荼，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存在一场观点大辩论。我们思考的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是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或是一个中间道路。因为其影响深远，这些政治理念对不同年龄的人都很重要。这些政治理念当然又导向大范围的、有关人性和社会本质的哲学理念。我1982年上大学，这一年恰好是主宰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的最后一场战斗。罗纳德·里根刚刚上台，他把苏联称为恶势力，而苏联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还大行其道，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争议的话题。

我和我的朋友会坐在咖啡馆里，热烈地争论美国的核势力，中美洲的代理人战争，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等等。差异是巨大的，答案是未知的，而影响呢，我们觉得是深远的。1983年，ABC播出了一部电视电影，名为《那一天之后》^[203]，刻画了核战争之后的美国生活面貌。这部片子在黄金时段播出，随后还有对当时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访谈，和一系列名人的座谈（亨利·基辛格、埃利·维塞尔、卡尔·

萨根、威廉·巴克利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之后的好几个礼拜，大家都在讨论这部电影以及它所涉及的政治和伦理问题。大学生对这类活动倾注了极大热情。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提倡禁止核武器。这所有的激情都源自于一个核心哲学——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宁主义和西方民主的政治争论。还是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大有不同，影响深远的大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少而又少。像《那一天之后》这样的片子不可能出现，更不要提引发讨论了。“九·一一”之后，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倒是引发了一些讨论，但这个话题的能量有限，对非穆斯林国家没有什么吸引力。即便是在穆斯林国家，圣战主义者之所以要采取恐怖手段，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理念只能说服一小撮极端分子。他们确实是一个威胁，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威胁。华盛顿的党派之争也颇为喧哗，但他们的政治差异是司空见惯的。比起三四十年前，他们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明显。其结果是，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熏陶，他们身上综合了一系列的理念——信奉资本主义，是社会上的自由派，支持社会福利，但是反对官僚和管制。这些加起来谈不上是一个热诚的政治哲学，绝对用不着设置街垒这样的激进措施。

我们的时代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技术所定义的，改变生活面貌的潮流来自于这些力量：新的信息革命能在一夜之间创立新产业，计算机学习的疆界不断拓展，医药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印度和中国的几十亿人崛起，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是企业家、技术专家和商人。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佐斯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这个地位是以往的政治明星才有的。年轻人所反映的，乃是今日之社会现实。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不是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而是这些经济和技术力量。这意味着大而无当的理论、通宵达旦的闲谈和慷慨激昂的演说已经没有太多用武之地。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年轻人清楚这一点。

这算不算是坏事呢？今天的学生脑子里想的事不是战争与和平，但那就不重要了吗？他们的偶像比过去的那些英雄人物就逊色吗？相对于冷战时期的社会，技术时代的极客文化对理念、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这又有什么不得了？譬如比尔·盖茨吧，虽然他现在老了，谈不上性感，但绝对是这个时代的偶像，是当代美国首批以非公众人物身份取得公众人物地位的技术企业家和商人之一。他很随和，头脑聪明，任人唯才，对自己的财富看起来也不怎么在意。这些品质都是值得流传的。盖茨同时也

对从科学到经济到教育的一系列问题感兴趣。他的演讲和博客充斥着书评、论点、分析和数据^[204]。他的滔滔不绝也许够不上哲学级别，但他对能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观念确实津津乐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当前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不论地域、肤色和国别。换句话说，这是基于一个众生平等的理念（只有少数慈善机构持有这个立场）。这个理念曾一度为基督教所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盖茨把它改造为一个世俗的理念，而且他要以世界首富的身份来支持这个事业。他的朋友沃伦·巴菲特，美国第二富，也把大多数资产捐赠在同样的用途上——不要任何功名，他甚至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基金会的大门上。这种谦虚和马歇尔的难道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在他的书和演讲中，大卫·布鲁克斯强调今天的年轻人缺乏一个词汇来描述其品德。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些年轻人“在道德上失语”^[205]。说实话，我们今天对“荣耀”、“贵族”、“德行”之类的词确实少用，但用这些词用来形容盖茨或是巴菲特恐怕是不为过的。这些榜样告诉我们，人可以从某些深刻的理念和价值观，从某种生命哲学出发，采取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行动。比起过去那些政治家或是军事家高谈

一种语言

高贵

阔论善恶、荣耀和牺牲，我们当代英雄的号召力似乎也不逊色。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像盖茨和巴菲特那样。今天的大学生也追寻道德和生命的意义，但他们追寻的方式不同。在这方面，每一代人和前一代人的方式不一样，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更实际，更讲究渐进主义。他们也追寻真理，但不像过去的那些英雄人物那样敲锣打鼓；他们要把这些大追求和过好日子现实需求结合起来。

HERI报告的数据显示，除了赚钱，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家庭^[206]。这个数字多年来都很稳定，曾一度上升，现在是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这是个资产阶级的需求，但说到底，赚钱养家，难道就一定是舍弃灵魂的追求吗？自由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今天的人可以不用天天担心革命、战争，而是可以安安心心地过小日子，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寻找意义、满足和幸福。我记得曾读到一名南非法官和一位美国学生的谈话，法官把她的国家里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种族隔离的废除，新国家的诞生）和美国报纸上提到的琐事相比，结论是，她非常希望有一天在她的国家里，报纸上的新闻也能这么琐碎，因为这意味着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正常化。

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充满了挑战，大量的社会

不公和失衡有待修正。但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我们得以幸运地培养私人的品德。约翰·亚当斯曾在美国革命期间写道：“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的艺术，所以我的子孙后代可以有闲暇来研究哲学和数学。我们的儿子们要学习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史、航海、造船、商业和农业，所以他们的儿子们得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陶艺。”^[207]也许今天他们没有在学习诗歌，而是在编应用程序，但这也是时代的召唤。

今天年轻人的野心也许不需要用游行示威，不需要用洋洋洒洒的古文来传达，但它们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我所想要的，就是为它做一个简短的辩护。我承认，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不论老幼，其实都没有机会好好反思人生。我们没有深深地反省自己的生命，并理解我们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对周围的世界或是历史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不能问出最深刻、最广泛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的答案是，我们都需要再来一点人文教育。

花费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

原书注解^①

1 来到美国

- [1]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3*. Table 322.10.这份摘要每年由国家教育统计局发布，是一份易于取得的高等教育统计数据源。其网址为：<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数据不断更新。
- [2] 有关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人文学科的兴起，参见 Louis Menand, “The Humanities Revolut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63–73; 以及 William M. Chace, “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merican Scholar*, Autumn 2009。人文指针 (The Humanities

① 注解中引用的英文作者人名及文献名不加翻译，以保留原貌，便于查证。

Indicators) 是一个美国科学艺术学院专门记载二十世纪人文科学起伏的网站, 网址: www.humanitiesindicators.org。

- [3] Philip Roth, *Portnoy's Complai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164.
- [4]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Digest*, Table 311.60.
- [5] 因为学科划分的问题, 各个渠道对人文艺术的评估不同。有些人 (Justin Pope, “Liberal Arts Colleges Forced to Evolve with Market,” Associated Press, Dec. 30, 2012) 认为, 在全国约一千七百万的大学生中, 有十万到三十万之间接受了人文教育。这也就是说, 他们上的是独立于大学的住宿学校。此文认为美国授予的大学本科学位中有三分之一是给了人文科学。国立教育统计中心文摘认为本科学生的数量是一千八百万左右 (表 303.60), 它把学位分成六大类: 人文科学、社会和行为科学、自然科学和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教育、商务和其他领域 (包括技能培训如农业, 警察等等)。如果说前三类是人文教育, 那么 2011 至 2012 年度授予的一千八百万本科文凭中近百分之四十属于人文教育的范畴 (表 318.20)。
- [6] Scott Jaschik, “Florida GOP vs. Social Science,” *Inside Higher Ed*, Oct. 12, 2011 (Scott quote); Kevin Kiley, “A \$10,000 Platform,” *Inside Higher Ed*, Nov. 30, 2012; and Kiley, “Another Liberal Arts Critic,” *Inside Higher Ed*, Jan. 30, 2013 (Bennett quote).
- [7] Scott Jaschik, “Apology from Obama,” *Inside Higher Ed*, Feb. 19, 2014.
- [8]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29.

- [9] 同上，第254页。
- [10] 有关尼赫鲁的经济观点参见Shashi Tharoor, *Nehru: The Invention of India* (New York: Arcade, 2003), 159–193; 和 Jawaharlal Nehru, “Temples of the New Age,” July 8, 1954, 参见网站 http://www.nehruinternationalconference2014.com/nehru_speech4.aspx.
- [11] “The Other America” : Fatma Zakaria, “The Other America,” *Times of India*, Mar. 28, 1982.

2 人文教育简史

- [12] Bruce Kimball, *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6), 16–17. 金巴尔此著提供了人文教育从古代到现代的详尽学术史。另请参见沃纳·耶格 (Werner Jaeger) 有关古希腊文化和教育发展的经典著作: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trans. Gilbert Highet, 3 vol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1944)。
- [1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ex Warner (New York: Penguin, 1954), 2.37.
- [14] Frederick Douglass, *The 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1881), in *Autobiographie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4), 527. Also quoted in Michael Roth, *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2.
- [15] 这是金巴尔在他的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人文教育有两个传

统，一个是演说家，一个是哲学家。

- [16] Werner Jaeger, “The Rhetoric of Isocrates and Its Cultural Ideal,” in *Paideia*, vol. 3: 46–70.
- [17] Bruce Kimball, *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6), 13.
- [18] Cicero, *On the Orator, Books 1–2*, trans. E. W. Sutton and H. Rackha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34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1.20.
- [19] Paul Abelson, *The Seven Liberal Arts: A Study in Medieval Cultur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5), 2.
- [20] Bruce Kimball, *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6), 51–52.
- [21] 有关伊斯兰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参见 Toby E. Huff,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 Islam, China, and the West*, 2n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7–89, 149–179。也参见Michael H. Shank,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15–231。
- [22] 有关nation的条目，请参见*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Academic Editi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14)。
- [23] Bruce Kimball, *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6), 75.

- [24] Paul Oskar Kristeller, “Humanism,” *Minerva* 16, no. 4 (Winter 1978): 586.
- [25] Andrew Delbanco,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6–37.以下有关教育的文集出版于五十年代，但毫不过时：A. Whitney Griswold, *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Ideal: And Other Essay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另参见以下教育漫谈之作：Michael Oakshott, *The Voice of Liberal Learn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6] Andrew Delbanco,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61–62.
- [27] Yale-NUS College, *Yale-NUS College: A New Community of Learning, a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Inaugural Curriculum Committee of Yale-NUS College* (New Haven, CT, April 2013), 12–13, available at <http://www.yale-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3/09/Yale-NUS-College-Curriculum-Report.pdf>.
- [28] Andrew Delbanco,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53–56.
- [29] Samuel Eliot Morison, *Founding of Harvard Colle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252, quoted in Delbanco, *College*, 41–42.
- [30] Andrew Delbanco,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9.

- [31] John Henry Newman, quoted in Delbanco, *College*, 41.
- [32] 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Academical Faculty,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 (New Haven, CT, 1828).
- [33] 同上, 第14页。
- [34] 同上, 第7页。
- [35] Philo A. Hutcheson, “Eliot, Charles William,” in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b.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anb.org/articles/09/09-00250.html>.
- [36] 有关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这个转型期, 参见Laurence R. Veysey,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 [37] Charles W. Eliot, “The New Education,” *Atlantic Monthly*, Feb.–Mar. 1869, 第一部分见网站: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869/02/the-new-education/309049/>。
- [38] “Charles William Eliot,” Harvard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harvard.edu/history/presidents/eliot> (accessed Aug. 21, 2014).
- [39] Ralph Waldo Emerson, “Self-Reliance,” in *Essays: First Series* (1841).
- [40] Charles W. Eliot, “Liberty in Education” (speech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lub of New York, 1885), in *Educational Reform: Essays and Addresses* (New York:

Century, 1898), 132–133, available at <https://archive.org/details/educationalrefor00elioiala>.

- [41] 有关艾略特和麦考士之间的异同，请见Andrew Delbanco,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82–90。
- [42] Louis Men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35. 这本书历史方面倒也罢了，但它对现代大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 [43] Mary Ann Dzurback, “Hutchins, Adler,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 Critical Jun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99, no. 1 (1990): 64–65; and Stringfellow Barr, “A Retrospective on St. John’s,” *Change* 6 (1974): 35, 63.
- [44] 所有采用“好书精读”的大学可以从下表（由William Case-ment编纂）得知：Association for Core Texts and Courses (ACTC) website: <http://www.coretexts.org/college-great-books-programs/> (accessed Sept. 15, 2014)。
- [45] Robert M. Hutchins, “The Great Conversation” (1952), in *The Great Conversation: A Reader’s Guide to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2nd ed.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46–73.
- [46] Martha C. Nussbaum,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3–34.
- [47] Andrew Delbanco,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0.

- [48] Stuart Rojstaczer and Christopher Healy, “Where A Is Ordina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rading, 1940–2009,”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14, no. 7 (2012): 1–23.
- [49] Brittney L. Moraski, “Report: Grade Inflation Persists,” *Harvard Crimson*, May 9, 2007; Matthew Q. Clarida and Nicholas P. Fandos, “Substantiating Fears of Grade Inflation, Dean Says Median Grade at Harvard College is A–, Most Common Grade is A,” *Harvard Crimson*, Dec. 4, 2013.
- [50] Anthony Kronman, *Education’s End: Why Ou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6.
- [51]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52] 同上，第15–16页。
- [53] 同上，第16页。
- [54] Lawrence H. Summers, “Remarks of President Lawrence H. Summers at the Massachusetts Life Sciences Summit” (speech at the Massachusetts Life Sciences Summit, Boston, MA, Sept. 12,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harvard.edu/president/speeches/summers_2003/lifesci.php.
- [55] Shirley M. Tilghman, “The Future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speech at Presidents Institute,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Marco Island, FL, Jan. 5,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princeton.edu/president/tilghman/speeches/20100105/>.

- [56] Yale-NUS College, “Yale- NUS College Welcomes Inaugural Class Exceeding 150 Students,” June 6,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yale-nus.edu.sg/newsroom/yale-nus-college-welcomes-inaugural-class-exceeding-150-students/>.
- [57] Yale-NUS College, *Yale-NUS College*. 自2010年的创始阶段以来，某些耶鲁教授和教师对新加坡缺乏人权自由的问题表示了关注。参见 Jim Sleeper, “Liberal Education in Authoritarian Places,” *New York Times*, Aug. 31, 2013.
- [58] Yale-NUS College, *Yale-NUS College*, 45–47.
- [59] John Henry Newman, “Knowledge Its Own End,” i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7), 101–102, available at <http://newmanreader.org/works/idea/dis course5.html>.
- [60] A. Bartlett Giamatti, “The Earthly U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and Ordered Space: The Real World of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118–126.

3 学会思考

- [61] Adam Lashinsky, “Amazon’ s Jeff Bezos: The Ultimate Disrupter,” *Fortune*, Nov. 16, 2012. Also see Brad Stone, *The Everything Store: Jeff Bezos and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3).
- [62] Norman Augustine, “One Cannot Live by Equations Alone: Education for Life and Wor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beral Education* 99, no. 2 (Spring 2013).
- [63] Yale-NUS College, *Yale-NUS College: A New Community of*

Learning, a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Inaugural Curriculum Committee of Yale-NUS College (New Haven, CT, April 2013), 25–29, available at [http://www.yale-nus.edu .sg/wp-content/uploads/2013/09/Yale-NUS-College- Curriculum-Report.pdf](http://www.yale-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3/09/Yale-NUS-College-Curriculum-Report.pdf).

- [64] A. Whitney Griswold, “On Conversation,” in *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Ideal: And Other Essay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68–69.
- [65]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引用同上文献。
- [66] Drew Faust quoted in Libby A. Nelson, “Gainful Employment Negotiations Wrap Up—DOJ Drops Voucher Suit—Harvard President Talks Quality, Value,” *Politico*, Nov. 20, 2013.
- [67] Howard Gardner, *The Disciplined Mind: Beyond Facts and Standardized Tests, the K–12 Education That Every Child Deserves* (New York: Penguin, 2000).
- [68] 同上, 第102–103页。
- [69] Thomas R. Cech, “Science at Liberal Arts Colleges: A Better Education?” *Daedalus* 128, no. 1 (Winter 1999): 209–210. 切赫的文章部分引用于 Shirley M. Tilghman, “The Future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speech at Presidents Institute,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Marco Island, FL, Jan. 5, 2010)。
- [70] Howard Gardner, *The Disciplined Mind: Beyond Facts and Standardized Tests, the K–12 Education That Every Child Deserves* (New York: Penguin, 2000), 126.

- [71] 参见加德纳对自己教育观点和E. D. 赫希（主张文化扫盲的教育家）的对比。同上，第252-260页。
- [72] 同上，第260页。
- [73] Steve Jobs quoted in Tim Carmody, “Without Jobs as CEO, Who Speaks for the Arts at Apple?” *Wired*, Aug. 29, 2011.
- [74] 有关扎克伯格对经典的兴趣参见Jose Antonio Vargas, “The Face of facebook,” *New Yorker*, Sept. 20, 2010.
- [75] Mark Zuckerberg quoted in Chase Larson, “Mark Zuckerberg Speaks at BYU, Calls facebook ‘as much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s it is technology,’ ” *Deseret News*, Mar. 25, 2011.
- [76] Bruce Nussbaum, “Get Creative!” *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ly 31, 2005.
- [77] David H. Autor, “Polanyi’ s Paradox and the Shape of Employment Growth” (paper draft dated Aug. 11, 2014, prepared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symposium at Jackson Hole, WY, Aug. 21–23,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kc.frb.org/publicat/sympos/2014/093014.pdf>. Also see FareedZakaria, “How to Restore the American Dream,” *Time*, Oct. 21, 2010.
- [78] Anya Kamenetz, “Why Education without Creativity Isn’ t Enough,” *Fast Company*, Sept. 14, 2011.
- [79] 维诺德·科斯拉2014年9月9日与本书作者座谈。
- [80] Michael Masnick and Michael Ho, *The Sky Is Rising: A Detailed Look at the State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Floor64,

Redwood City, CA, Jan.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techdirt.com/skyisrising/>.

- [81] Christine Di Grazia, “Yale’s Life-or-Death Course in Art Criticism,” *New York Times*, May 19, 2002; and Holly Finn, “How to End the Age of Inatten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 2012.
- [82] *It Takes More Than a Major: Employer Priorities for College Learning and Student Success*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2013).这份调查报告对人文教育做出如下设定：
“这种大学教育既提供知识的广度，又注重专门领域的深度。它帮助学生培养社会责任感，以及在一系列领域（交流、分析、问题解答）的知识和实践技能，能成功地把所学运用到实际场合。”
- [83] Joan Burrelli, Alan Rapoport, and Rolf Lehming, “Baccalaureate Origins of S&E Doctorate Recipients” (Info Brief, NSF 08-311,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ivision of Resources Statistics, Arlington, VA, July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08311/>. Also see Thomas R. Cech, “Science at Liberal Arts Colleges: A Better Education?” *Daedalus* 128, no. 1 (Winter 1999): 195-216.
- [84] Norman Augustine, “One Cannot Live by Equations Alone: Education for Life and Wor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beral Education* 99, no. 2 (Spring 2013).
- [85] Edgar M. Bronfman, “Business and the Liberal Arts,” *Inside Higher Ed*, Oct. 17, 2013.
- [8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Skills Outlook 2013: First Results from the Survey of Adult Skills (OECD Publishing, 2013).

- [8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n and Can Do—Student Performance in Mathematics, Reading and Science* (Volume I, Revised edition, February 2014) (OECD Publishing, 2014).
- [88] Elliott A. Medrich and Jeanne E. Griffith,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ssessment: What Have We Learned?*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Feb. 1992), available at <http://nces.ed.gov/pubs92/92011.pdf>.
- [89] Diane Ravitch, *Reign of Error: The Hoax of the Privat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Danger to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New York: Knopf, 2013), 65. 拉维奇对美国在国际评估中的差强人意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但她以此为据，认为美国的教育系统不需要大家（包括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所提倡的种种改革。
- [90]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IMSS), available at <http://nces.ed.gov/timss/> (accessed Aug. 13, 2014).
- [9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2014), 204.
- [92] Tharman Shanmugaratnam被引用在Fareed Zakaria, “We All Have a Lot to Learn,” *Newsweek*, Jan. 8, 2006。其另一本书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也引用了这段对话。

- [93] 有关亚洲对人文教育的兴趣，包括本段所列举的例子，参见 Yale-NUS College, *Yale-NUS College*, 14–22。
- [94]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at a Glance* (OECD Publishing, 2014), 91. Also see the extremely interesting book by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Twelve, 2009).
- [95] “Most Innovative in the World 2014: Economies,” *Bloomberg*, at <http://www.bloomberg.com/visual-data/best-and-worst/most-innovative-in-the-world-2014-economies> (accessed July 28, 2014).
- [9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ISA 2012 Results*.
- [9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ISA 2012 Results: Ready to Learn: Students' Engagement, Drive and Self-Beliefs* (Volume III) (OECD Publishing, 2013). PISA 对数学自信的评估是看学生是否同意五个陈述，比如：“我学数学很快”或是“我数学就是学不好”。表 III.4.2a (第 304 页) 提供了每个国家的样本学生中对每个问题回答的情况，总分是由五个类别的国家比例取平均值而来。
- [98] William Bennett, *The De-Valuing of America: The Fight for Our Culture and Our Children*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2), 42–43.
- [99] Amy Chua and Jed Rubenfeld, *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2014).

- [100] 如Keith Baker, “Are International Tests Worth Anything?” *Phi Delta Kappan* 89, no. 2 (Oct. 2007): 101–104.
- [101] 如Eric A. Hanushek and LudgerWoessmann, *The High Cost of Low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The Long Run Impact of Improving PISA Outcomes* (OECD Publishing, 2010).
- [102] Heiner Rindermann and James Thompson, “Cognitive Capitalism: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Ability on Wealth, as Mediated through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Economic Freedo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no. 6 (June 2011): 754–763.
- [103] Jonathan Wai, “Of Brainiacs and Billionaires,” *Psychology Today*, July 3, 2012.
- [104]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4), 22.
- [105] Bill Chappell, “U.S. Students Slide in Global Ranking on Math, Reading, Science,” National Public Radio, Dec.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pr.org/blogs/thetwo-way/2013/12/03/248329823/u-s-high-school-students-slide-in-math-reading-science>.
- [106] House Education and Labor Committe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ducation Agenda: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 111th Cong. (May 20, 2009) (statement of Arne Duncan, Secretary of Edu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24, also available at <http://votesmart.org/public-statement/427845/hearing-of-house-education-and-labor-committee-the-obama-administrations-education-agenda#.VCQ5UWRdVy8>.

- [107] Malcolm Gladwell,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8).
- [108] C.Custer, “Jack Ma Explains Why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Fails to Produce Innovators,” *Tech in Asia*, Dec. 9,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techinasia.com/jack-ma-explains-chinas-education-system-fails-produce-innovators/>.
- [109] 几十年来都是如此。里根时代有一份颇具影响的美国教育现状报告 [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1983)] 推荐学区和州立法者“认真考虑”延长每个学年的在校时间为两百天到二百二十天，以便和其他工业社会并肩。然而，就美国的学年如何与其他国家的学年相比，存在一定争议。参见 Jim Hull and Mandy Newport, “Time in School: How Does the U.S. Compare?” Center for Public Education, Dec.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enterforpubliceducation.org/Main-Menu/Organizing-a-school/Time-in-school-How-does-the-US-compare。>
- [110] Philip S.Babcock and Mindy Marks, “The Falling Time Cost of College: Evidence from Half a Century of Time Use Dat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5954, Apr.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nber.org/papers/w15954>.
- [111] Richard Arum and Josipa Roksa,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112]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Academically Adrift*,” Learning in Higher 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t <http://highered.ssrc.org/publications/academically-adrift/>

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accessed Sept. 1, 2014).

[113] Malcolm Gladwell, interview by Fareed Zakaria, *Fareed Zakaria GPS*, CNN, July 21, 2013.

[114] 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4 自然贵族

[115] David Brooks, “Our Founding Yuppie,” *Weekly Standard*, Oct. 23, 2000.

[116] Walter Isaacson, *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3.

[117] Benjamin Franklin, *Proposals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Youth in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749), in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Yale University, at <http://franklinpapers.org/franklin/> (accessed Sept. 17, 2014). 有关富兰克林教育的观点参见 Lorraine Smith Pangle and Thomas L. Pangle, *The Learning of Liberty: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3), 75–90。

[118] Isaacson, Benjamin Franklin, 147. 有关富兰克林的种种努力参见已故历史学家 J. A. Leo Lemay 详尽但未完成的传记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3: *Soldier, Scientist, and Politician, 1748–175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176–216。

[119] Walter Isaacson, *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55–60.

- [120] Dudley Herschbach 被引用在 *Walter Isaacson, 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129。
- [121] Committee of the Virginia Assembly, “A Bill for the More General Diffusion of Knowledge,” June 18, 1779, in *Jefferson Papers*, Founders Online, National Archives, <http://founders.archives.gov/about/Jefferson>. For more on Jefferson’s ideas about education, see Pangle and Pangle, *Learning of Liberty*, 106–124.
- [122] Michael Roth, *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22.
- [123] Jon Meacham, *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468.
- [124] “Jefferson’s Vision of the Academical Villag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vailable at <http://www.virginia.edu/academicalvillage/vision.html> (accessed Sept. 24, 2014).
- [125] Thomas Jefferson 被引用在 Michael Roth, *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26。
- [126] 同上。
- [127] 同上，25页。亚当斯的教育观点请见 Pangle and Pangle, *Learning of Liberty*, 91–105。
- [128] Thomas B. Edsall, “The Reproduction of Privilege,” *New York Times*, Mar.12, 2012.

- [129] Anthony Carnevale被引用在Thomas B. Edsall, “The Reproduction of Privilege,” *New York Times*, Mar.12, 2012.。
- [130] Larry Abramson, “Why Is College So Expensive?” *All Things Consider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Oct. 19,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pr.org/2011/10/19/141505658/why-is-college-so-expensive>.
- [131] 伯克利的学费请见 <http://admissions.berkeley.edu/cost-of-attendance>。
- [132] Elizabeth A. Armstrong and Laura T. Hamilton, *Paying for the Party: How College Maintains Inequ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33] Fareed Zakaria, “The Thin-Envelope Crisis,” *Time*, Apr. 15, 2013.
- [134] William Bowen and Sarah Levin, *Reclaiming the Game: College Sports and Educational Valu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同样问题之前已有James L. Shulman and William Bowen, *The Game of Life: College Sports and Educational Valu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claiming the Game* 提供了更新的统计数据, 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博文的观点。
- [135] Ron Unz, “The Myth of American Meritocracy,” *American Conservative*, Dec. 2012.
- [136] Jerome Karabel,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5).

- [137] Michelle Jamrisco and IlanKolet, “College Tuition Costs Soar: Chart of the Day,” *Bloomberg*, Aug. 18, 2014.
- [138] 威廉·鲍莫尔和威廉·鲍恩的成本疾病理论最先出现于以下著作：*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A Study of Problems Common to Theater, Opera, Music, and Dance*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6)。
- [139] Robert H. Frank, “The Prestige Chase Is Raising College Costs,” *New York Times*, Mar. 10, 2012, 被引用在威廉·鲍恩*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 [140] 鲍恩对高等教育的成本和产出的精辟分析最先是出现于他在斯坦福大学2012年有关人文价值的坦纳演讲中，参见*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1–27。
- [141] Richard Arum and Josipa Roksa,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142] Fiona M. Hollands and Devayani Tirthali, “MOOC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Center for Benefit-Cost Studies of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May 2014), 57.
- [143] Doug Lederman and Scott Jaschik, “Survey of Faculty Attitudes on Technology,” *Inside Higher Ed*, Aug. 27, 2013.
- [144]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nn GSE Study Shows MOOCs Have Relatively Few Active Users, with Only a Few Persisting to Course End,” Dec. 5,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se.upenn.edu/>

pressroom/press-releases/2013/12/penn-gse-study-shows-moocs-have-relatively-few-active-users-only-few-persist; and Andrew Dean Ho, Justin Reich, Sergiy O. Nesterko, Daniel Thomas Seaton, Tommy Mullaney, Jim Waldo, and Isaac Chuang, “HarvardX and MITx: The First Year of Open Online Courses, Fall 2012–Summer 2013” (HarvardX and MITx Working Paper No. 1, Jan. 21, 2014), 2, available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81263.

- [145] 如Tamar Lewin, “After Setbacks, Online Courses Are Rethought,” *New York Times*, Dec. 10, 2013.
- [146] Coursera CEO理查德·莱文2014年8月30日与本书作者座谈。
- [147] Ho et al., “HarvardX and MITx,” 2.
- [148] 理查德·莱文与本书作者座谈。
- [149] 有关密涅瓦计划详情参见 Graeme Wood, “The Future of College?” *Atlantic*, Aug. 13, 2014.
- [150] Salman Khan, *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 Education Reimagined* (New York: Twelve, 2012).
- [151] Stamenka Uvalic-Trumbic, Remarks at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UNESCO Global Forum on Rankings and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Paris, France, May 17,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ol.org/resources/speeches/2011presentation/Pages/2011-05-16.aspx>.
- [152] 理查德·莱文与本书作者座谈。
- [153] Ho et al., “HarvardX and MITx,” 25.

- [154] 同上, 以及Gayle Christensen, Andrew Steinmetz, Brandon Alcorn, Amy Bennett, Deirdre Woods, and Ezekiel J. Emanuel, “The MOOC Phenomenon: Who Take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and Why?”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ov. 6, 2013), available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50964.
- [155] Christensen et al., MOOC Phenomenon, 11. 参加调查的 34,779 个回应者可以在四个选项中找出自己参与的理由, 结果如下: “纯粹是好玩” (50.05%), “获得特殊技能, 以便更好地工作” (43.9%), “获得特殊技能, 以便得到新的工作” (17.0%), “获得知识, 以完成学位” (13.2%)。

5 知识和权力

- [156] Ingrid D'Aulaire and Edgar D'Aulaire, *D'Aulaires' Book of Greek Myths*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92).
- [157] Aeschylus, *Prometheus Bound*, ed. Alan Weissman, trans. George Thomson (New York: Dover Thrift, 1995).
- [158] 《圣经·创世记》2: 3, 詹姆士国王版。
- [159] Thomas Gray, “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 (1747), in *Thomas Gray Archive*, available at http://www.thomasgray.org/cgi-bin/display.cgi?text=odec#panel_poem (accessed Sept. 15, 2014).
- [160] Cicero quoted in John Henry Newman, “Knowledge Its Own End,” i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7), 104, available at <http://newmanreader.org/works/idea/discourse5.html>.

- [161] Richard Dawkins, “Apes with Big Brains: Richard Dawkins on What Makes Us Human,” *New Statesman*, Jan. 6, 2014.
- [162] Jacob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 (London: BBC Books, 2011), 19.
- [163] 伯特兰·罗素经常谈到科学和哲学，尤其是在《宗教和科学》 [*Religion and Scienc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一书中。本处的引言来自他1959年和英国记者伍德罗·瓦伊特 (Woodrow Wyatt) 的访谈, [https:// archive.org/details/BertrandRussellDiscussesPhilosophy](https://archive.org/details/BertrandRussellDiscussesPhilosophy)。这篇访谈后来收入瓦伊特的书 *Bertrand Russell Speaks His Mind* (1960)。
- [164] 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 A. L. Peck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36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4.1.766a.
- [165] Charles Panati, *Panati's Extraordinary Endings of Practically Everything and Everybo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265–267; and “Source Analysis— Death of Charles II Based on Scarborough's Description,” GSCE Bitesize, BBC News, available at [http:// www.bbc.co.uk/schools/gcsebitesize/history/shp/mid dleages/earlymodernsurgeryrev5.shtml](http://www.bbc.co.uk/schools/gcsebitesize/history/shp/mid_dleages/earlymodernsurgeryrev5.shtml) (accessed Sept. 15, 2014).
- [166] 有关历史上的平均寿命参见 S. Ryan Johansson, “Medics, Monarchs and Mortality, 1600–1800: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Driven Health Transition in Europe”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o. 85, University of Oxford, Oct. 2010)。有关目前的平均寿命见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available at [http:// 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 [167]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 [168]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从1962年的45岁上升到2012年的75岁。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2005年美元换算）从1963年的88.24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3,583.38美元。所谓的四十倍，要看你怎么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美元价值，以及市场交换或是购买力。
- [16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在全球范围内，每千例出生中低于五岁的死亡率从1960年的182.7降低到2013年的45.6。
- [170] 例如参见Jeffrey D.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Soon,” *New York Times*, Sept. 24, 2013。
- [171] Matt Ridley, *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1).
- [172]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Books, 2011), 129–188.
- [173] 同上，第378–481页。
- [174] 例如参见Donald Kagan, “Aveatque Yale,” *New Criterion*, June 2013。
- [175] Herbert Simon被引用在Fareed Zakaria, “Blood Lust in Academia,” *New Republic*, July 27, 1987, 16–18。
- [176] Nicholas Kristof, “Don’t Dismiss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Times*, Aug. 13, 2014.

6 为今日之年轻人辩护

- [177] 这句话（“Making a Living, Making a Life”）出自丹尼尔·罗斯198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地产发展中心开业典礼上的讲话。现在收入罗斯的同名著作*Making a Living, Making a Life* (Essex, NY: Half Moon Press, 2014)。
- [178] Joel Stein, “Millennials: The MeMeMe Generation,” *Time*, May 20, 2013.
- [179] David Brooks, “The Organization Kid,” *Atlantic*, April 2001.
- [180] 同上。
- [181] William Deresiewicz, *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2014).
- [182] 同上，第221页。
- [183] Meyer Reinhold, “The Generation Gap in Antiquity,” and Barry Baldwin, “Young and Old in Imperial Rome,” in Stephen Berman, ed.,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76), 15–54, 221–234.
- [184]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 [185]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 [186] Anthony Kronman, *Education's End: Why Ou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87] 见斯蒂芬·平克对德莱塞维茨的回应, “The Trouble with Harvard: The Ivy League Is Broken and Only Standardized Tests Can Fix It,” *New Republic*, Sept. 4, 2014。
- [188] 参见*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这是一系列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年度报告, 专门介绍大学新生的数据。从六十年代开始的报告可以在以下网址得到: <http://www.heri.ucla.edu/tfsPublications.php>。
- [189] J. H. Pryor, S. Hurtado, V. B. Saenz, J. L. Santos, and W. S. Korn, *The American Freshman: Forty Year Trends, 1966–2006*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CLA, April 2007), 31–34.
- [190] 参见“和平队”的简报, “The Peace Corps Announces Record-Breaking Application Numbers in 2014,” Oct. 8, 2014; and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press release “Ameri Corps Week Marked from Coast to Coast,” Mar. 23, 2012。
- [191] 参见“为美国而教”的简报, “Teach for America Announces Record Number of Teachers for 2008,” May 14, 2008。简报中提到“教育美国”2014收到了超过五万份申请。
- [192] Joel Stein, “Millennials: The MeMeMe Generation,” *Time*, May 20, 2013.
- [193] 同上。

- [194] Elspeth Reeve, “Every Every Every Generation Has Been the Me Me Me Generation,” *Wire*, May 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thewire.com/national/2013/05/me-generation-time/65054/>.
- [195] Brent W. Roberts, Grant Edmonds, and Emily Grijalva, “It Is Developmental Me, Not Generation M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no. 1 (Jan. 2010): 97–102.
- [196] *Millennials: Breaking the Myths* (New York: Nielsen, 2014). 某些尼尔森报告中的数据来自下文提到的凯斯基基金会的2013年度报告。
- [197] *Inspi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Workforce: The 2014 Millennial Impact Report* (Achieve and the Case Foundation, 2014), available at http://cdn.trustedpartner.com/docs/library/AchieveMCON2013/MIR_2014.pdf.
- [198] Scott Hess, “Millennials: WhoThey Are and Why We Hate Them” (TEDxSF, June 2011),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n HH-r_FM.
- [199] David Brooks, “Politics and the Organization Kid” (Stafford Little Lecture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Nov. 26, 2012), available at https://mediacentral.princeton.edu/media/1_b7in7m0e.
- [200] Reid Hoffman, *The Start-up of You: Adapt to the Future, Invest in Yourself, and Transform Your Career*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 [201] Abby Kiesa, Alexander P. Orłowski, Peter Levine, Deborah Both, Emily Hoban Kirby, Mark Hugo Lopez, and Karlo Barrios

Marcelo, *Millennials Talk Politics: A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 Political Engagement* (Medford, MA: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n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Nov. 2007).

- [202] Pryor et al., *American Freshman: Forty Year Trends*, 33; and K. Eagan, J. B. Lozano, S. Hurtado, and M. H. Case, *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 Fall 2013*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CLA, 2013), 40.
- [203] *The Day After*, directed by Nicholas Meyer (New York: ABC, 1983).
- [204] 比尔·盖茨的个人网页为<http://www.gatesnotes.com>。
- [205] 例如参见Brooks, “Politics and the Organization Kid.” 以及 David Brooks, “If It Feels Right...,” *New York Times*, Sept. 12, 2011。
- [206] 最近的数据请见 Eagan et al., *American Freshman*, 40。
- [207] 约翰·亚当斯致阿比盖尔·亚当斯书信, May 12, 1780, in *Adams Family Papers: An Electronic Archiv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available at <http://www.masshist.org/digital-adam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人文教育辩护/(美)扎卡里亚著;梁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33-1953-9

I. ①为… II. ①扎… ②梁… III. ①人文素质教育—研究
IV. ①G40-0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5021号

为人文教育辩护

策划编辑:张立宪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韦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80897213

官方网站:www.duku.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5

版 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953-9

定 价:2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DK-ZHC-CASE-1503-01-75G-230-ST

